

卷首语

学习国际关系之我见

孟维瞻

中国的国际关系专业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之中，学习国际关系这个专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但对于处于研究生阶段的我们，一般而言，学好国际关系专业有五大关键。

第一，精通至少一门外语。语言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关键工具，只有精通至少一门外语才能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提高研究的可信度，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跟踪前沿研究。可这一直是很多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瓶颈。但我们不能被卡出，必须过语言关，这样才可能做出有信服力的研究。

第二，认真进行理论学习和知识储备，培养扎实的理论功底，形成厚重的知识积淀，若要进行地区、国家或国际组织研究还要深入了解要研究的领域。这两个，做到任何一个都很不容易。厚积方能薄发，新一代人务必“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切忌毫无问题意识和现实感，妄谈理论和现实感，空谈大体系、大格局、大战略。

第三，要有良好的研究方法训练。目前而言，科学实证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学科发展，几乎每一个进步，都是与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息息相关。有两种方法比较重要，一是严格的案例分析法，二是定量分析。还有定性分析方法也很重要。能实证的一定要先去实证，不能实证的才用非实证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适宜，要根据研究对象和想要论证的命题而定。目前，中国学生很少接受严格的方法论训练，因此尤其要加强。当然，理论、思想也必不可少，尤其要有人文、价值理念关怀，否则就会导致国际关系学者都成了只会做实证的“工匠”，失去了方向，而成不了思想者。成为一个思想者，比成为工匠更难，但成为工匠也是成为思想家的前提。

第四，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进行交流和对话，要持包容开放的态度相互学习、讨论以共同进步。国际关系研究不能够闭门造车，只有开放式的交流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取得知识和学问上的进步。

第五，找好学习和研究的方向，扎实研究，注重历史。最重要是做扎实的研究，找准方向，保证自己研究的可靠性。研究要更可靠和扎实，历史就显得重要起来，学好历史是做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一步，这是基础，但还不够，国际关系研究要提供规律性的理解，必须有学术研究方法和工具。同时，要知道我们只有在研究实践中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培养自己的研究能力。



道
不遠
人，遠
人
非
道
也。

夏
洪
二〇一二年五月





卷首语

学习国际关系之我见/孟维瞻

学人访谈

南开大学韩召颖教授访谈录 1

专家特稿

反思美国在中东和东亚的外交政策/阿米泰·艾奇奥尼 9

国际问题研究

国家—社会互动关系下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
——以台湾视角下的 ECFA 为例/柴逸扉 18

共同事业与多样需求——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
武装政策分析 1950-1955/吴宇 34

身份迷失的新逻辑：中国为何缺乏连贯的对外战略/阮家栋 49

学术随笔

“政治哲学与城邦”专题

纯粹的理念、浑浊的经验——政治哲学与
历史的遭遇/刘仲敬 66

走出城邦——从两岸交流史说起/周生升 72

天下

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效应 80

话语·幽默 84

游记

南方六省骑行记/吴途勇 86

独家风景/张玉瑶 93

光影世界

“甲方乙方”：中国式梦想/董成龙 99

外面的世界——电影《暖》随想/陈安龙 101

国关要闻

专题报道

第九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 105

聚焦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 107

“中亚：大国的交汇于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118

“印度洋的安全合作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120

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刊物论坛 121

简讯 123

院外播报 125



南开大学韩召颖教授访谈录

学人小传

韩召颖: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多次赴美访问讲学,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担任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著有专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译著《美国无敌》、《超越国界的活动家》、《遏制民族主义》以及论文《公众外交: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富布赖特项目与中美文化交流》、《美国政府对华文化关系活动初探》等中英文论文20余篇。

如何看待大学生自办刊物和论坛

《闻道》: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的《新视界》是学生自主管理的一个刊物,一直以来也得到了您的支持,那您如何看待学生刊物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

韩: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自主地组织学术活动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一部分大学教育,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比较普遍,因此如何引导学生自觉地自主进行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因为高考和升学的压力而不得不被动学习的话,那么到了大学,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自主学习。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能够在大学阶段真正的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自由、自主地去学习。

2009 年开始, 我们的学生提出要办这样的一个刊物, 系领导和老师都非常支持。其实在过去的 10 年, 我们南开的学生都有很多自己组织的学习活动, 比如论坛、兴趣小组以及读书会。但这些活动有一个问题, 就是非常零散、断断续续, 坚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中断。对于学生来讲, 组织筹备这样的活动, (可以) 激发他们的兴趣, 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所以它虽然只是一个刊物, 但它能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有很好的扩散效应, 能带动一批学生, 特别是激发他们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 鼓励他们开始去探索学术研究。我们要引导学生进入一个领域和学术殿堂, 就需要这样一个引导性的平台, 而不能仅仅依靠课堂的方式和知识。这样一个以硕士生为主体、博士生参与、有时还能吸引一些本科生的团体, 一方面让硕士生具备了学术的基本素养, 同时也像种子一样培养着一批本科生。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校也都非常支持。

我们南开一直很重视“公能教育”, 这是一种全面的素质教育, 这种教育并不仅是中小学那种是为培养学生的兴趣而进行的那种教育, 在大学阶段必须有个全新的解读。现在的大学最近 20 年来受商业化浪潮的冲击, 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不多, 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如何激发学生独立学习的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论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也非常支持, 因为学生非常渴望有一个跟全国其他院校的学生交流的机会。就目前来说, 这样的论坛在中国还不多, 去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办了第一届, 今年在南开是第二届, 我们也是想方设法进行支持, 尤其是财力上的。但是, 因为一届学生也就三年,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样的刊物和论坛能够坚持下去。我们觉得这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 作为老师、院系也都应该使这种学生自主管理的学术交流机制维持下去, 这也能够促进高校的发展。创新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 它需要一种机制来维持学生这种创新的意思。

《闻道》: 这些刊物的发展中有哪些问题?

韩: 我比较关注持续性。我经常向这些刊物的编辑强调, 不能干完一届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后续的骨干和参与者。如果做不到, 那就证明这个主编做得不够格。光有热情不行, 要有机制和持续下去的毅力。所以持续性非常重要, 要能够延续下去。

另外, 就是内容要能够适合于学生的特色。既然是学生的刊物, 我们是要有一定的学术性, 但是不能过分地强调学术性, 它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学生的刊物, 不是纯学术的, 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学

生通过刊物来了解专业和专业所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走上学术、专业的道路，同时要有很强的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版面要灵活、活泼，百花齐放。还要注意信息性，要尽可能提供学生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就业、国外交流等。所以要兼顾好学术性、趣味性和信息性。

关于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和问题

《闻道》：能否谈谈您个人的学习和学术的成长过程？

韩：我们这代人和中国的国关学科的成长可以说是同步的，是一个探索过程。我们本科的时候没有国关专业，甚至政治学的都比较少，很多研究者都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所以这也涉及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个学科的专业性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在专业方面都是靠自我训练。比如我博士是历史学，虽然与国际关系相关，但是要想真正从事国关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自我培养和学习得来的。到了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重点院校的水平也跟国外相关学科的水平相接近。但我们还应该承认存在着各种差距，比如课程体系、课程分布方面等等都还有差距。

在我看来，专业的训练非常重要，比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文献的学习。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方法论的训练。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不同专业跨到国关领域的，所以方法论的训练应该说是不足的，而且这个不足是先天性的。另外，我们在突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比如历史学、法律、哲学、经济学等等，也要适当的接触这些学科的知识。这些年，我们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应该说在很多学校还是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去改善。

《闻道》：您刚才也提到国际政治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落后和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些落后和不足是怎样影响到学界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比如最近的南海和钓鱼岛问题？

韩：坦白地说正是由于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足，我们在处理外交和对外战略问题的时候显得不够专业。但是最近十年对外交往的经验和交往技巧还是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提高与我们广泛的国际交往实践的学习，以及学科发

展所带来的知识上的学习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学科发展上的不足。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决策者和外交实践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因为这些人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尤其是 40 至 50 岁之间的这批人都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因为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发展还不是很健全的原因，包括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大学教授和学者应该自我反省，我们没有为我们输送出去的人才提供更好的、更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教育训练。不过，在一次国际论坛上有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反省意识很强，这说明我们国家还是在向前发展。所以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

《闻道》：您认为，国际政治学界应如何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论和问题研究，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提供思想资源？

韩：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偏重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国际安全研究方面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比例相对较少。这与中国最近 20 年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实践有关。相比美国，我们的特色比较明显，中国更多谈的是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和谐世界等等，而对于国家安全策略的分析应该说不够多。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关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而翻阅中国国关领域的杂志则可以发现，这方面的比例不大。虽然国际合作也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方面，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国家安全、战争和平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忽视，这显然是与我们学科整体发展的先天不足有关系。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显得很突然，这证明我们在学理上准备的不足。如果我们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那么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能想到的办法也固然不会太多。

关于中国的外交

《闻道》：您说到的正好涉及到我们想问的下一个问题。以钓鱼岛争端为例，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棘手，除了因为中国本身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外，背后隐约有美国的因素。美国是一个安全和战略研究比较完备的国家，她的外交战略对中国的钳制作用体现在哪里？

韩：我的思路基本是这样的：谈钓鱼岛问题不能离开中日关系问题，谈中日关系不能撇开中美关系。钓鱼岛问题可以说是冷战甚至二战遗留下来的

问题，但是钓鱼岛问题的突出与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变换相关联。我们现在来看，钓鱼岛问题是和美国相关的，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借机挑起钓鱼岛问题。反之，钓鱼岛问题体现出的中日关系反映了中美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的变化。当中国实力地位越来越接近美国时，美国就出现战略焦虑，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就是一种战略焦虑。美国一直讲“中国威胁论”，可是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修订，实际上并非崛起的大国挑战主导型国家，而是维护现状的国家会对崛起大国主动采取手段，比如，发动预防性战争。

2009年我在美国的时候表明，现在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因为这种权力转移，使得美国很有可能找些小的原因和局部问题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当时我就判断会在南海和东海出现问题。这并不是我先知先觉，而是通过国际关系的相关学习，通过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认识而得出的结论。当然这些问题都是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即所谓的美国在亚太战略再平衡，用我们的话就是美国重返亚太。但美国人自己讲，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美国是 *rebalancing, refocusing, pivoting Asia*。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背景在现象上可以做出解释，中日钓鱼岛问题完全印证了这点。

我们原来一直讲战略机遇期，如果说这指的是在美国开始重视我们之前，我们自己要发展好，但现在美国已经盯上我们了，那么我觉得中国的机遇期已经不多、快要结束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至少在未来 20 到 30 年中美实力在接近的过程中，摩擦和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国家的利益冲突是很难回避的。中美之间有很多的经济和社会交往，这些固然很重要，但安全利益还是首位。况且美国对全球是起主导作用的，当她不能主导全球的时候，她就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当然，我们也应该正常的看待这个问题，交往多了，摩擦自然也就多，甚至比较严重的冲突都有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直讲不选边，但实际上她自己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钓鱼岛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局部的中日关系或者领土争端问题，它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

《闻道》：权力的转移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一个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刚刚韩老师谈到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认知。反过来，我们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视角出发，随着力量的崛起，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中国该如何去认知世界体系的变更、美国和跟随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安全需

要？很多人在批判说，中国在经济力量崛起的情况下，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仍显现出很大的不足，就是因为中国无法提供可以代表中国利益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其他国家利益的议程，而往往是被动地适应美国权力体系下的一系列议程。

韩：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反思现在的外交。今天中国出了现在这种局面，不仅仅是因为亚太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还因为中国的作为不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国家利益。这个转变得到了时代的认可，但后来，我们国家的外交就滞后于国家发展。这个滞后体现在什么地方？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却始终持一种弱国心态。我们在实力上升后没有做好准备去跟这个世界接触，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跟世界接触的方式和心态还停留在 80 年代的水平，甚至更早。

前些日子，李显龙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人现在对自己强大了的认识和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间存在差距，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从政治上来讲是对的，但是除了“发展中国家”这个政治上的界定之外，我们已经是一个世界强国了。与之相关，我们在反思中国外交的时候，一个是说我们在外交上应该有的投入不够，比如我们在周边没有朋友，甚至在世界上真正的朋友都不多。当国家用一部分钱来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总是会有一部分杂音，说我们国内尚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应该先解决当下国内的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对外交往和国家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对外交往包括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外援助，比方说让别人更加了解中国。那种认为我们应该将养老、贫困、教育等问题解决好之后再去做对外援助，再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论调，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常识的。

《闻道》：可否这样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提出很好的战略和构想，所以使得很多国家看到中国现在的发展和一些外交举动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韩：战略和构想是一方面，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投入不足，包括物力、思想的投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只关注国内问题的发展，不知道国家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开放、对外交往。比如，有人说我们中国自己都还有很多学校没有建设好，就去建孔子学院，拿钱给外国人，我们吃

饱了撑的。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孔子学院一年的投入大概也就不到一亿美元，但成效是很明显的。在对外交往时，一个是在思想战略方面怎样才能主动设置议程，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赢得朋友、培育新朋友，和他们达成共同的利益，这样对我们的安全才会有帮助，而恰恰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做，或者说做的不够。如果现在不投入，等你需要还债的时候，你的投入可能多于现在的十倍，形成的问题也会更麻烦。这一方面是学科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思想上或者说是能够为国家作支撑的知识产出不足。

关于公共外交

《闻道》：直言不讳地说，有些学生批评孔子学院已经建滥了，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韩老师您当年在美国担任过孔子学院的院长，那根据您的工作经验，能否给我们说一下孔子学院的实际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韩：客观来讲，采取孔子学院这样一种形式，是突破了我们原有的对外宣传的那种思维，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说建设的过多，会出现质量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够专业，孔子学院作为公共外交的活动之一无可非议，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一个道德说服的手段，这是最没有力量又是最有力量的、最和平的（手段），就是我们讲的软实力。

我不太赞成现在国内一些把公共外交看成灵丹妙药的思维，我觉得公共外交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有人说可以通过公共外交建立国家之间的互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这种互信绝对不是完全能够靠公共外交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我在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时候，发现她的公共外交就是一种辅助手段，是理想主义者非常推崇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影响，它是起作用的，有时候作用也挺大，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所以看中国的公共外交时我们也需要先有这样一个定位：有比没有要好。广义上讲就是一种对外宣传，我们一直都有，1990年代以前的对外宣传，意识形态都太强了。我们最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外交从手段上 and 专业化水平来说，技巧和方式都丰富了，也反映了我们学科的一个贡献。但是问

题也有，我们把公共外交看成无所不能，也是一个问题。孔子学院只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

我们还要把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区分开来，现在民间的经济关系占到国家关系中最大的一部分。政府对于文化交流的参与是有限的，起个补充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一定不要让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掩盖民间的交流。改革开放 30 年，民间的交流还是主体。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交流都看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官方的，是为了弥补民间交流的不足。比如，我们旅游团出去给人不好的印象，国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多些，那我们就讲，中国也有文明的人，但我们不是去完全否定别人的报道，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我们有问题，我们也有进步和好的方面。公共外交是致力于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建立，千万不要以为国家的形象完全是靠公共外交建立的。

所以孔子学院，尽管由于发展得很快，有着各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成效并且在不断发展。既然是公共外交，一定还是要跟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协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协调还是不够。当然公共外交除了孔子学院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宣传。我们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的对外交往，更多的要退到幕后，间接地发挥作用，而让民间的交流任其自然的发展。这才是公共外交的本质。

《闻道》：那您觉得美国的公共外交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韩：美国的公共外交还是起一个纠偏的作用。美国形象的传播靠什么？靠它的技术、文化，比方说麦当劳、iPhone、好莱坞电影、牛仔裤。中国和美国不同，我们的公共外交是防御性的，都是针对外界认为中国是威胁这种说法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公共外交是进攻性的，它有很强的价值观念在里面，是通过软性的手段让人们去接受自由民主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我们要对公共外交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和认识。

(采访：李沛、吴途勇)

(整理、编辑：曾乔圆、孟舒)

专家特稿

反思美国在中东和东亚的外交政策*

阿米泰·艾齐奥尼**

核心提示：阿米泰·艾齐奥尼（Amitai Etzioni）曾担任卡特政府的高级顾问（senior adviser），曾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文为编辑部向艾齐奥尼教授约请到的专稿，并参考了艾齐奥尼教授近期发表的几篇文章的观点。艾齐奥尼教授的主要论点是，美国的重返东亚政策，现在是不合时宜的，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对手且可以成为美国的伙伴，中东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的安全威胁主要也来自中东。这可以看作是他对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建议。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东亚”政策，其实目前是不合时宜的。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对手且可以成为美国的伙伴，中东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的安全威胁主要也来自中东。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中国都不太会对美国构成致命性的威胁。

这些年，美国处理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国家的问题，显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沮丧。而相比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则显得不需要牺牲太多美国士兵的生命，也不需要太多开支，情况也不严峻。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亚太的政策，很容易有所成就：中国的几个邻国选择了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越南、菲律宾甚至缅甸都加入其中。这些国家追随美国，去“组团”对付中国了，而中国现在则只能是“单挑”。这一地区其实主要显得非常和平与稳定。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五角大楼有一个先天的偏好，即更擅长于常规的作战方式。而在中东，美国更需要的是

* 本文为《闻道》编辑部向阿米泰·艾齐奥尼（Amitai Etzioni）教授约请到的专稿，由编辑部成员负责翻译。艾齐奥尼教授的研究助理艾希利·麦金利斯（Ashley McKinless）为本文的翻译提供了重要指导，并提供了其他辅助材料，译者对此表示感谢。

** 阿米泰·艾齐奥尼（Amitai Etzioni），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曾在卡特政府中担任过高级顾问。他的最新著作有《热点：后人权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Hot Spot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Human-Rights World）。

非常规的作战方式。对于那些游说集团而言，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他们代表的是美国的各类公司，特别是军工商。如果是建造 F-22 或者 F35，似乎他们能赚到更多的钱。而如果美国重点发展特种部队，则需要大量的手枪、刀子和军服，军工商从中无利可图。

的确，中国有一天可能会成为一个区域大国，可能会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然而，这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目前，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中东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东问题的处理，其影响将远远超越这一地区，这关系到美国的全球地位，也包括美国在远东的态势。本文将分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挑战，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其实是可以延缓一下的，这种做法才是有利于美国的。我讲列举几条原因证明我的观点，尽管不是全部的原因。

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考验

美国似乎不想在中东继续经营下去了。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出了全部军队，并打算在 2014 年底之前从阿富汗撤出全部军队。实际上，美国担心伊拉克会被什叶派控制，成为伊朗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还是试图维持其在伊拉克的据点，至少在那里还有 15000 人是穿着军服的工作人员。为了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据点，美国也试图在阿富汗建立永久性的基地。在索马里和也门，美国也在和那里的基地组织作战。这些挑战都是当下存在着的，与远东的情况大不相同。

“阿拉伯之觉醒”使得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埃及局势变得动荡，并威胁着美国的其他盟友，如巴林、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一些美国观察家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将使这些国家变得更加亲近西方。然而，这些觉醒的国家似乎正在朝着伊斯兰化的方向发展着。尽管这些国家新上台的领导人宣称他们将以温和、中立的态度对待西方，但依然很难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或人民会欢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情况并不乐观。例如，据调查，穆巴拉克倒台后，目前在埃及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对西方抱有好感，而且埃及政府是否会采取温和政策依然是个未知数。又如，尽管利比亚著名的伊斯兰军事领导人贝尔哈吉曾宣称，利比亚的伊斯兰教是温和的，并宣称利比亚过渡委可以效仿土耳其的发展模式，但西方国家对类似的言论依然持怀疑态度。

及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在 2002 年埃尔多安上台后，也变得

越来越伊斯兰化了，开始与西方疏远，并与伊朗接近。在埃尔多安第一个任期，土、伊两国的贸易额增长了六倍。尽管有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但伊朗的金融还是能获得来自土耳其的银行的支持。两国在政治上也日益密切。2009年伊朗的选举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争议，但在内贾德当选之后，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的就是土耳其领导人。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形容这次选举是“富有活力的和广泛参与的”，^①且完全是伊朗的内政。2010年，在美国刚刚成功说服俄、中两国同意支持对伊朗增加制裁之后，土耳其与巴西就提出了关于铀浓缩问题的新议案，在此之前它们已经与伊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谈。很多观察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伊朗的一个拖延策略，目的是使得议案不付诸表决。而安理会表决这一问题的时候，土耳其还是投了反对票。尽管从某种程度上看，土耳其也将伊朗看作是其在中东的竞争对手，但这种竞争关系并不明显，而且相比较而言，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是越来越疏远的，而与伊朗则是越来越亲近的。

伊朗与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挑战

其实，美国在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应该说还是伊朗与巴基斯坦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伊朗在发展核武器。因此美国必须要处理好当下的问题，这比20年之后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也有一些人认为，可以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因为这样符合相互威慑的原理。他们认为可以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只需要合理运用核威慑就行了。而且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②尽管奥巴马政府并未正式同意这一看法，但很多人认为这种策略其实可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任领导人约翰·阿比扎德就认为，美国可以用对俄、中两国的策略对待伊朗，因为首先使用核武器意味着毁灭，而伊朗是不会寻求自杀的，威慑原理同样适用于伊朗。法里德·扎卡利亚也认为，伊朗的宗教领导人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保持其权力，因此他们自卫的本能将会使美国的遏制战略奏效”。^③肯尼斯·沃尔兹是有限核传播论最著名的支持者，他认为核威慑是100%有效的，通过核威慑获得和平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中东和南亚。这些学者普

^① http://icps.gwu.edu/files/2012/09/A446_the_United_states_premature_pivot_to_asia.pdf.

^② <http://edition.cnn.com/2012/02/06/opinion/etzioni-iran-deterrence/index.html>.

^③ http://icps.gwu.edu/files/2012/09/A446_the_United_states_premature_pivot_to_asia.pdf.

遍认为，伊朗领导人并不是疯子，可以明智地做出决定。^①例如，在 2003 年，美国以极小的代价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朗就对美国展示出了温和的姿态。当时美国总统曾说，伊朗是“邪恶轴心”名单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②换句话说，伊朗有理由认为自己会遭到进攻。因为，根据威慑理论的支持者，国家要么是纯粹理性的，要么是纯粹非理性的，这说明伊朗和其他“流氓国家”可以合理地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反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不是疯子，因此他们都是理性的。

然而，社会学家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决策行为，即被某种信念所支配的行为。例如，在某种信念的支配下，一个人可能会将屠杀的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确实会对事实与压力做出反应，但这事实与压力仅仅能影响到信念的作用方式，而无法影响信念本身。例如，对于一个狂热的伊朗领导人而言，他会坚信是真主在命令他彻底摧毁特拉维夫，他只会考虑以何种方式来进攻异教徒，而不是考虑是否进攻异教徒。^③即使是理性的领导人，他们也会有误判形势的行为，导致其国家的人民有大量的伤亡，甚至自己的统治被推翻。^④希特勒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也自以为可以大伤美国元气。德国与法国都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一战的发展进程。

假如伊朗真的有了核武器，这将会给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一旦伊朗有了核能力，它将会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将会给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提供更多的支持，甚至将会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其结果是，即使伊朗政府不使用核武器，也能实现其革命目标，恐怖分子也可以在伊朗核武器的保护下肆意妄为，其邻国将被拖入危险的军备竞赛。

德黑兰政府理性与否，这并不重要。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西方国家将不得不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雅尔塔式的协议，即美国可能会从波斯湾地区撤军，这将会使得波斯湾周边的那些小的公国不满，也会让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基督徒无法接受。还有一点很重要，伊朗或者其他“流氓政权”的核武器有可能会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即使伊朗领导人并不支持这样做，恐怖分子或许也会通过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组织获得核武器。

^① <http://edition.cnn.com/2012/02/06/opinion/etzioni-iran-deterrence/index.html>.

^② <http://edition.cnn.com/2012/02/06/opinion/etzioni-iran-deterrence/index.html>.

^③ <http://edition.cnn.com/2012/02/06/opinion/etzioni-iran-deterrence/index.html>.

^④ <http://edition.cnn.com/2012/02/06/opinion/etzioni-iran-deterrence/index.html>.

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以为，美国可以宣称，如果恐怖组织使用核武器进行攻击，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向受害国提供帮助。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是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我们无法及时确定威胁的来源，或许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很难说我们能有可信的反击威胁的办法。即使美国能够威慑伊朗，一旦冲突发生，伊朗还是有可能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面临的主要威胁。

众所周知，美国还需要处理巴基斯坦问题，这也是当务之急。目前，巴基斯坦正在升级其核武器制造水平，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过去几年增长了一倍。据估计，巴基斯坦目前有 90 到 110 枚核弹头，未来十年将会增加到 150 到 200 枚。而这些核武器都处于不安全的保存状态。有情报专家测算，巴基斯坦有 15 处核武库可能会成为极端组织渗透的目标，这样的企图已经发生了六起，我们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大多数人都认为，一旦恐怖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将成为其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巴基斯坦。

美国如何处理其在中东面临的挑战，如何处理它与盟友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与敌国的关系，不仅会关乎到美国在中东的安全与本土安全，也会深深地关乎到美国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可信赖的盟友。尽管美国很难在中东各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权，但至少可以让穆斯林国家成为支持和平的战略伙伴。^①

美国应继续让中国成为美国的伙伴

美国政府，现在开始逐渐地将中国描述为侵略性的超级大国，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做战争准备。^②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道德上的威胁”。其他在任或离任高官也有类似的看法。的确，尽管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宣称，它们不想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我们还是能找到很多好战的声音。例如，中国的朱成虎少将就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中国应该首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③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点非常之低，中国的军队官僚化程度非常之高，

^① <http://icps.gwu.edu/hot-spots/>.

^②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③ <http://www.ft.com/intl/cms/s/2/28cfe55a-f4a7-11d9-9dd1-00000e2511c8.html#axzz2DFZ045qc>.

而且效率很低。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如非国有企业或者非军事企业。中国的潜艇设计水平非常之差。中国没有多少军事通讯卫星，核轰炸机也都处于被淘汰的水平。除了激进的鹰派人物，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不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威胁。

因此，美国对中国可以持放心的态度，在断定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之前，美国可以继续让中国成为美国的伙伴。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保证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运输线路的安全，只要不违反美国的利益即可。如果中国同意通过国际法庭裁决或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美国应该对中国表示支持。至少美国不应该再鼓动中国的邻国妨碍中国获得其正当利益。

笔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其实是良性的，而且中国将会融入到国际社会，完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只有当中国变得不再执行和平政策的时候，西方国家才需要调整政策。^①如果西方以敌对的态度处理对中国的关系，那么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中国更加执行强硬路线。^②

目前，远东局势正在变得日益紧张起来，特别是中、日之间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美国已经意识到，这种趋势并不能成为遏制中国的有利机会。实际上，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先努力使得各方能够冷静起来。^③

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做法是，采取了介于接触与遏制之间的政策，美国希望中国周边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中国对沿海岛屿的领土要求。但是，近期美国也开始调整了政策。帕内塔呼吁中、日之间“不要让局势失控”，强调各方都有责任和平解决争端。^④美国智库的学者们，也在帮美国政府寻找大量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建立首脑热线，还是签订备忘录，都是热门的解决办法。尽管有些人认为这很幼稚，但其实这些办法的确能奏效，历史上有先例，例如乌克兰与罗马尼亚之间关于黑海的争端，就解决地比较成功。^⑤

^①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②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③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④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⑤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华盛顿方面应该在解决冲突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促使各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各种方法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①因为目前来讲，全球经济非常脆弱，各国民族主义的增长会导致冲突失控，现在如果紧张状态真的升级，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尽管资源分配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但资源本身有一个有点，即能够被分解，“赢者通吃”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应该是让各方都能够有所获得而非失去脸面。相反，如果冲突真的失控，无论是当事方还是旁观者，都将成为输家。^②

远东：目前还不是美国的威胁所在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位居一系列新兴国家之首，这将构成一次巨大的权力转移。然而，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规模。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美国是从一个很高的水平开始衰落的，而中国是从一个很低水平开始崛起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度增长，到 2050 年，美国的 GDP 依然是中国的三倍左右。虽然现在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四倍，但中国的人均财富水平却依然很低。目前，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是以经济福利为基础的，与之密切相关的应该是人均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有 47240 美元，而中国却只有 4260 美元，还不如厄瓜多尔和阿尔及利亚。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和美国有很大差距。而且这项统计还没有考虑到中国发生政治剧变的可能，也没有考虑到环境恶化和人口结构恶化的可能。和中国相比，美国人口中青年的比例较高。

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与意图，有着不同的估计。美国早就有鸽派官员指出，目前中国的军事规模还是很小的。^③中国官方公布的 2009 年军费的数字是 700 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则认为应该是介于 1225 亿美元和 1750 亿美元之间。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军费实在太少了。^④美国的军费

^①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②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ooler-heads-the-south-china-sea-7520?page=1>.

^③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④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开支是中国的六倍还多，美国有数千件核武器，而中国只有数百枚。美国有 11 艘航空母舰，而中国直到 2011 年 8 月才只建成了一艘航空母舰。^①即使是美国的鹰派人物，也认为中国只能在东亚对美国形成制衡，而不可能成为全球力量。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未来几十年还赶不上美国。陆伯彬（罗伯特·罗斯）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能成为地区战略力量，还需要好几十年时间，要成为全球战略力量还遥遥无期。^②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环境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中国军费增速也会降低。^③

鹰派人物认为，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保持在亚洲的优势。他们警告，一旦美国军事力量退化，东亚地区将面临灾难性后果。至少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地控制了亚洲，而美国无法达到其长远战略目标；而第二种是其他亚洲国家会自行采取办法抵制中国，它们将被迫大力扩充军备，甚至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结果就是，亚洲就仿佛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而且各国还都是各自拥有核武器的。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美国所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昂贵的。

但是，鹰派的观点并不现实。我们很难预测，在未来 20 年中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武器。在 20 年之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无人机和网络战争在今天的重要作用。因此，过早的承诺或者过早承担义务，都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在今天的预算很紧张的时代。即使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但要是想让远东取代中东成为美国的前沿阵地，依然是不合适的。

也有人会认为，美国有能力应付两个威胁。毕竟美国一直在做着“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准备。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防开支未来有可能会被削减，可能是削减 4500 亿美元，也可能是 1 万亿美元。的确，至少有一个重大战略变化会发生，即美国将会放弃同时在两个地区作战的战略准备。根据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如果要想集中精力经营好第一地方，就会对另一个地方放松控制。例如，小布什政府主要关注的是伊拉克，但对阿富汗却比较忽视。

我近期出版了一部新书，名叫《热点：后人权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

^①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②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③ <http://edition.cnn.com/2012/01/06/opinion/etzioni-china-enemy/>.

(*Hot Spot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Human-Rights World*)。^①我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热点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尽管这种联系并不是立即以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是相互联系的，这将使美国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地缘政治战略，以面对各种挑战。^②但就目前来讲，美国面临的真正热点问题，其实是在中东，而非在远东。当下，美国其实可以把中国当作是潜在的全球性的伙伴，而非对手。

美国应对中东的挑战，任务是繁重的。美国尚未制定好战略，来应对巴基斯坦国内可能发生的问题，无法保证阿富汗以伊拉克未来的稳定，伊朗问题则更加棘手。^③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将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尽管这样做会增加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得分，因为美国很容易让越南和缅甸疏远中国，但这样做对美国的实力与全球地位并无帮助。同时，美国的中东盟友，如果受到了来自伊朗的巨大压力，都会有被美国出卖的感觉。美国的确有超凡的能力，保持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并有能力推广国际航海自由原则，但这并不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通道未来的安全。即使美国能够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以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但这对美国自己的安全却并无太大帮助，因为一旦恐怖分子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将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威胁。

(译者：孟维瞻)

(责任编辑：周生升)

^① <http://blog.amitaiezioni.org/2012/10/hot-spots-book-discussion.html>.

^② <http://blog.amitaiezioni.org/2012/10/hot-spots-book-discussion.html>.

^③ <http://icps.gwu.edu/hot-spots/>.

“政治哲学与城邦”专题



【编者按】：政治哲学与城邦是把脉中西政治文明的关键问题，诞生于古典城邦时代的政治哲学，一直在寻找理想的城邦，却在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历史结果。或许，用纯粹的理念遭遇混沌的经验，来形容历史与政治哲学相遇最为恰当。

就城邦的思想视界来看，城邦世界与世界城邦是古今纠葛不断的两种世界图景。而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曾经的犹太人十分相似，极其珍视自身所传承的城邦世界特质。于是，世世代代的血统性传承，祖祖辈辈的历史性传说，岁岁年年的民族性藩篱不断的加固、深化，以至于在无数人的肉身上都打下了深重的烙印，忘却了另一种在自身血液中曾经萌动过的世界城邦的图景。我们想以这个专题为起点激发大家在这一视野和图景下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

——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刘仲敬^{*}

孔子为中国式“清议”传统确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子为了避免恶意曲解，在注释中补充了一条下限：“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鉴于他本人就受到过“钳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这个补充很有必要。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如在伦理

^{*} 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系。

学方面精密，但经验性总结“论政热情”仍然相当可靠。政治冷漠总是出现在两个极端：其一是“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高压统治；其二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平庸化社会。处士横议、民气汹涌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间状况；这时“X国之命运”似乎多多少少悬而未决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响历史路径的选择。

纳博科夫评论美国的俄罗斯流亡社区，称他们的文化水准高于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是：（俄罗斯）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光荣和悲惨斗争，以及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但他们的下一代对政治极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以外，还能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们身边的美国社会始终属于巴比特的精神后裔。收入丰厚的管子工和卡车司机用怜悯的目光打量大学教授，俄国人称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圣的光环。

在这种国本已定的平庸社会中，沉默的保守主义深入全民、无孔不入、无比自信，足以将任何离经叛道者变成小丑。对“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者）而言，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会说出布尔什维克宁可受人憎恨、绝不受人嘲笑的话。相反，高压统治下，官方保守主义跋扈齐鸣、貌似强大；却更象是要塞部队四面受敌、亟需寻找自信，可惜不太成功。

由此可见，“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崛起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形势。“公众人物”本人的政治哲学水准是高是低，其实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在许多决定国运的历史转型期，主要公众人物的言论之幼稚、混乱、自相矛盾，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不大可能降低他们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自古至今，有理有据的政治哲学家倒是很少能影响公共生活。卡莱尔鄙视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空洞无物，显然以为自己的《法国革命史》高出后者好几个档次；但英国的历史路径早已决定“文学政治”此路不通，英国文人的个人能力根本无关紧要。很少有人知道：罗伯斯庇尔原先是保王派；九一八事变后，谴责“不抵抗政策”最积极的人物其实是汪兆铭。

政治哲学以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为对象，人性远不像环境、物质那样容易在短时间内剧变。因此，在政治哲学上实现理论创新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迄今存在的大多数政治制度都不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阐述的六种基本原型范围。大多数自诩的“创新”都可以纳入两类：其一，概念混乱

和错误；其二：有政治意图的广告文宣。这两个集合有交叉，奥威尔的“新话”就同时属于这两类。即使在通常自诩的自由世界，大多数人使用“自由”的方式都不会获得麦迪逊或阿克顿勋爵的赞许。

如前所述，“清议”或“论政热情”的上升只能确定一件事：公众要么是越来越不满现状，要么是对现状的可持续性不放心。讨论集中于政治哲学，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说明国本斗争正在隐秘地展开。在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 或“合乎宪法形式的权威”）稳固的国家，讨论一定会集中在“问题”而非“主义”上。在中国，国本斗争过于频繁地出现，其实是这个国家历来缺乏法统的体现。

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学》原典，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本身一定会带来良治或恶政。但他相当肯定：君主制优于僭主制，贵族制优于寡头制，共和制优于民主。也就是说：有法统的“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一定优于“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而这三者本身的优劣却要看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这种倾向其实很接近梁任公在清末民初提出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中华》月刊，1915年8月30日）。因此，梁任公同样支持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共和制、同样反对君主专制和革命专制，结果获得了“流质善变”（梁启超，《答和事人》，《新民丛报》，1903年12月2日）的恶谥。后来流行的革命史观正好以此论证“从激进到保守”的万能公式。

政治家梁启超的失败可能有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意见领袖”梁启超的失败就不能说与中国人的心理定势无关。《三国》、《水浒》、三十六计的民间政治哲学（“成王败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真正深入全民的思维模式，官方政治制度的变化从来没有触动它。这种模式翻译成政治学语言，就是：“权力属于一切有能力攫取权力的人。君主等于僭主，共和等于民主。”因此，权力就是权力的证明。中国人变成了政治色盲，不能区别事实政权与合法政权，认为这些不过是虚伪形式或文宣策略。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于：贵族封建制早衰，社会平等化早熟，政治专制与社会平等相互支持。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自秦政取代周政以后，不可能存在软弱而神圣的合法政权。西欧君主或日本天皇可以维系历史传统，化身为立宪君主制的支点。但中国式朝代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仅在于当时政治家的低能

和政策失误（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存在），而在于：朝代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僭主制而非君主制，依靠赤裸暴力建立，在赤裸暴力中灭亡。不是为所欲为的霸君，就是任人宰割的孱王；其间并无中间道路。除赤裸暴力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尊重。因此，革命和反革命都能天然吻合朝代政治，但立宪政体却是十足的另类。在中国，（黎元洪式）“软弱的合法政权”只会博得升斗小民发自内心的鄙视，一如霸君不难获致受害者的宽容、理解、甚至崇拜。如果历史的确选择了什么；那么两千年秦政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路径依赖。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以下的历史路径：

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简陋的文明没有不同于私人事务的公共事务，更不知有公共财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欧洲的通则，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与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王国或采邑的事务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无关。

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公认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方发生冲突时，以战争、决斗、司法来裁决。三者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司法就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决斗形式。法庭不是凌驾于冲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于冲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冲突各方常常有选择不同司法体系的余地。不同司法体系常常会为了吸引顾客一当事人而优化法律和程序，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法律和程序会积累为成例。这就是习惯法的自发进化史。

领主与封臣经常发生战争、决斗或诉讼。司法裁决缺乏强制力，结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战争、决斗或诉讼。因此，战争、决斗和诉讼都是封建西欧的自然状态，和平反而是特例。因此法学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声势通常仅次于教士与贵族。

当封建体系没有预料和准备的新事务出现，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传统范围，超过封建体系能够负担的程度时；各阶级选出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分担费用。这就是国会或等级会议。公共事务就是这样起源的，最主要的公

共事务就是筹款。

当政府征税和用税必须经纳税者（可以是纳税各阶级或法人团体，不一定是纳税人）同意和管理时，自由或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诞生了。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它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举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 Property）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连这两个词都只能在欧洲语言中才能读出原有的涵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乡镇中人口较多的，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

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

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

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

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 20 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制的许多镇压技术。

历史经验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本身就是答案，无须另外寻找答案。如果历史经验仅仅是一部分智慧的源泉；那么，迄今政治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具体历史经验，仍然具有理念原型的意义。因此，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反应。我们只能回到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点，用自己的经验为未来提供路径。

亚里士多德的六种基本原型有一个隐含的结论，就是：单纯而绝对的权力（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大抵是恶政；有法统的权力（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应该是混合政体。君主有别于僭主，就在于他必须尊重先于他而存在的各阶级传统地位。贵族制必须注意保存人民权力、共和制必须注意保存贵族权力，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则短命速亡。他论证的基础不在于抽象理论，而在于希腊各城邦长期政治实验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不久，西塞罗鼓吹：“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混合政体最为优秀，远远超过过分民主的雅典政制和东方僭政。

此后，“混合政体优越论”占据了西方政治学传统的大半壁江山，马基雅维利、福斯蒂丘、阿克顿勋爵都跻身于这个传统中。他们论证的基础也在于西欧封建“各等级共治”的现实政治经验，根本没有考虑过以下的问题：如果缺乏政治经验的群体把局部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作半神圣性的教

条，试图以逆向思维修改数千年积累形成的历史路径，结果会怎样？从经验和常识判断，这种问题不大可能有唯一和普遍的正确答案。只有在众人走过的地方，道路才会出现。

（责任编辑：陈安龙）

走出城邦

——从两岸交流史说起

周生升*

前言：城邦是一种封闭的环境，人们生活其中，祭拜着城邦诸神，经历生老病死。城邦与城邦之间是战争与征服的关系，即使有着共同的神，人与人也永远以“异邦人”互相称谓。但在柏拉图《理想国》中，他试图带领人们走入一种新的城邦，一种无所不包、没有边际的城邦。

中国人^①的视野曾经一度达到过这样一种世界城邦的地位，但秦汉以降又逐渐地走回了自己的城邦世界。两岸现状，看似是 1949 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而实际上关系到中国人如何再次走出封闭城邦。本文将从两岸关系史出发，以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海洋中国与陆地中国两个角度来浅析中国人的城邦问题。

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

中国的概念是什么？在大陆，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指的

* 周生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① 本文所使用“中国”、“中国人”来源于 5000 年中国历史概念之下产生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是中华民国。在古人眼里呢？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子欲居九夷”。中国究竟在哪？其要害处在于，中国二字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来界定。此章探讨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之变。

要界定中国，我们必须回归到中华民族形成的源头——先秦时代。当时，已产生夏夷之分。《礼记·王制》载：“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种看似带有地理中心意识的夏夷之分，是当时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源于古代世界民族间交流的限制，导致从自身出发去认识世界。这现象亦可见于其他古代文明，如希腊人将德尔菲神庙称为世界的中心等。但是，阅读大量先秦文献，我们并不能得出“中”等于优越性及“蛮夷”等于野蛮之地，而更多是一种方位体现，也就有所谓“五方之民，皆有性也”。邹衍的大九州说便是例证之一：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①

在今人看来，这种世界视野是多么令人赞叹！然则世界之中国，或称夏夷之分，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界定呢？余英时先生提到，文化是具有超越性的^②。文化中国是一个超越性的共同体。李云泉先生在《朝贡制度史论》中提出，夏夷之辨重文化而不重血缘与种族，“征诸先秦史实，且不说秦、楚夷性十足，即使被奉为华夏文化正统源头的夏商周三代，也带有鲜明的夷狄特征。”对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在孟子的说法中得到证实：“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人也。”^③但舜和文王依旧被后世视为华夏之先王，何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 相关论述见余英时著：《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第1—22页，论“文化超越”。

^③ 《孟子·离娄章句下》。

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

因为这种一以贯之的“礼文化”在贤王身上得到体现，所以以血缘区分夏夷就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文化之于“中国认同”是具有首要地位的，同时中国文化又是普世性的。《春秋公羊传》在记载鲁昭公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一事时，以蔡、陈、许等诸夏之国所行“非礼”，称之为“新夷狄”。更值得回味的是，鲁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大败晋国，孔子在《春秋》中却以楚为礼而贬晋。^②由此可见，以地理划分夏夷的意识在先秦时代并不清晰，夏夷明显存在互换，其标准是行“中国之礼”。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中国的界定，如果放到当今，我们是否可理解为任何人只要行的是“中国之礼”、中国之文化——但“中国之礼”、中国之文化究竟何在？这需要当代学人的阐释——便可称中国人呢？或是华人？华夏人？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但自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逐渐走向了地理中心意识的夏夷之分，这是政治中国形成的重要标志。汉代班固在阐述汉匈关系时，援引“内诸夏外夷狄”之古训，明确提出以地之内外划分夏夷的关系，“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③后世亦产生如南朝，“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④；清朝，“中土局大地之中，瀛环四海，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⑤等等说法。这显然与先秦夏夷之变的开放性形成了对比。更为重要的是，以地之内外划分夏夷，逐渐使中国的概念陆地化，失去了海洋特性。

台湾——“海洋中国”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的大国。从版图上看，有约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海洋国土面积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① 《论语·为政》。

^②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4—225 页。

^③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第 202 页。

^④ 僧祐：《弘明集》，卷 7，《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 1989 年影印。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3，《四裔考一》。

陆地国土的 1/3。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海洋传统，虽长期受到“黄土文明”的压抑，但其在民间却生生不息。台湾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中国的概念扩展到台湾，根据史书记载，较可信的说法最早似乎可追述到三国时期^①：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穀。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②

此处夷洲的土地风貌被认为与台湾相似。需要注意的是，在宋元时期以前，史书中较为明显地记录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一是《三国志》记载三国时代吴国曾指派军队登陆夷洲，二是《隋书》则有隋炀帝派兵攻打琉求国的记载。但对于这些中国古籍中的记载的地名就是今日的台湾尚存争论，同时似乎也没有关于台湾的朝贡记录。^③既然中华帝国早已登陆过台湾，那为何在史实记载中出现长时段的空白？这就是上文所提出的，秦汉以后对于陆地中国的强调^④，导致了海洋中国的消散。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华帝国直到南宋时期才将台湾纳入政治版图^⑤，而南宋的政治中心正巧处在沿海地带，海洋中国才又逐渐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在之前就不具有海洋性。日本学者松浦章在《中国的海贼》一书中，考察了汉朝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海贼活动，提出海贼的出现是在海上成为政治、社会、经济等舞台的时代之后，即从汉代开始，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具有了政治上

^①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中提到的东鯤可能就是台湾。——资料来自日文维基百科：台湾。

^② 《临海水土志》。

^③ 根据有两点：1，如果台湾隶属中国，则必然有地方志；2，如果是对外关系，秦汉以后的中外关系，通过朝贡制度来实现，则应当会记入史书，如《汉书·大秦传》等。

^④ 关于强调陆地中国的原因是复杂的，粗略而言，一方面是逐渐被误读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一方面可能与西北边境的蛮族、匈奴战乱有关，关于后者可参阅弗雷德里克 F 梯加特著：《罗马与中国》，丘进译，大象出版社。

^⑤ 南宋时期，已经有汉人在澎湖群岛，开垦。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 年)，正式驻兵澎湖群岛，隶属闽南晋江县。1225 年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提到“泉有海岛，曰澎湖群岛，隶晋江县。”正式确认澎湖群岛属南宋版图。——资料来自中文维基百科：台湾。

的意义，换句话说，以中原为中心发展而来的中国文明，到了公元后，已经出现了能够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力量。本章试通过海盗活动与海外贸易的紧密结合以及台湾移民历史来研究这种力量抗衡。

以台湾海贼最为活跃的明末清初为例。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时，协助荷兰担任福建官吏中介的是海寇李旦。李旦是泉州出身的海贼，在吕宋经商遭西班牙殖民者陷害后，逃亡日本并得到德川幕府的朱印状^①，不仅频繁在台湾、越南、吕宋进行贸易，还在荷兰、英国的商人和当地人之间做中介，其势力很大。^②1625年，李旦在（日本）平户去世后，同年，另一名大海寇颜思齐占据台湾，并开始在福建、浙江沿海进行攻掠活动。之后继承这两大势力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台湾郑氏家族创始人——郑芝龙。他在台湾、福建沿海一带活动有如下记载：

芝龙无家可归，遂加入颜思齐之党徒。并拉弟郑芝虎、豹、鸿逵入伙，来到位于南海中的名为台湾的大岛，不久，思齐去世，附随的军兵见芝龙胆大勇猛，人皆随之……芝龙自幼在船上为人做向导，善于带兵，用割符收取来往于南海之商人船之税。每年得千万两，其富无人可比。^③

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④

海贼会成为贸易中介或者贸易方，与朝贡制度有着直接关系。上文已论述自秦汉以降，由于地理和观念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只有通过朝贡制度来实现，不仅对于民间与海外的私自贸易严令禁止，而且对外国来贡也有着“贡道”、“贡期”^⑤等极为严苛的规定，阻碍了外国来华贸易。官方垄断贸易加上中国民间和国外强烈的贸易需求，必然造成非法贸易。海贼在掌握了武力资源的前提下，为非法贸易庇护也就合情合理了，而国外对非法贸易也是持欢迎态度，如《明史·和兰传》记载了海澄人李锦及商人潘秀、郭震等私通荷兰人并提出可以占据澎湖岛屿或者贿赂地方官员进行贡市贸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掠夺活动，既说明沿海地

^① 获德川幕府许可在海外进行贸易的命令文书。

^② 松浦章著：《中国的海贼》，谢跃译，商务印书馆，第83页。

^③ 佚名著，丰子恺译：《落洼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

^④ 同治《重撰福建通志》卷二六七。

^⑤ 贡道规定外国使者来华朝贡时必须从特定路线登陆中国；贡期规定外国多少年能来华朝贡一次，短则一年一贡（或多贡），多则十年一贡。

区发展之兴盛，也可推测当时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的管理力不从心，或者说无心管理。

台湾作为海洋中国的一部分对陆地中国的叛逆不仅体现在海贼与对外贸易上，移民现象同样值得关注。荷占以前，台湾已有闽粤移民，闽粤人很早便知道台湾，并与台湾接触；但闽粤移民大量入台，披荆斩棘，以事垦殖，则始于明末。^①此时明王朝虽处于“海禁”政策之下，但却发生了大量移民入台，其外在因素是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依赖“鱼盐之利”吸引大批华人移民，记载于《台湾府志》：“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又连横著《台湾通史》载：“天启四年（1624年），荷人入台湾，借地土番。‘数年之间，地利日辟，厥土黑壤，一岁三熟，而华人来者日多，凡有一万五六千人，以与中国、日本互市。’”^②内在因素则是，明王朝内忧外患，自顾不暇，已无法顾及东南沿海，才使“海禁”形同虚设。进入清王朝后，台湾移民进入一个高峰期。但也经历由严禁到开放的四次政策调整过程。^③第一，减赋招徕。清廷统一台湾时，把郑氏亲族、明室诸王、官吏、兵卒等都迁离台湾，同时岛上大陆移民也多趁此返回故乡，导致了台湾人口急剧减少。在这一背景下的招徕政策，使得大批大陆沿海各省过剩人口进入台湾。第二，严限渡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以后，闽、浙海贼再度兴起。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实行了严厉的边检制度，严禁渔船装载货物，接渡人口，其结果是严重限制了台海的贸易和移民。第三，开放渡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始，准许人民自由携眷入台，但以在台的居民为限。其背景源于清廷初入台湾时规定赴台者不得携眷，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人口组合失调，酿成社会的不安。这一政策对于台湾的开发无疑是一道福音。第四，鼓励渡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奉命整理台湾。他提出清朝官吏所治不过台湾领土的三分之一，其余为番社。为此必须实行开山抚番。开山即扩大汉人居住地域；抚番即促进番民汉化。由此，光绪元年正月奏准废除内地人民入台耕垦禁令，招募闽粤移民。这是两岸史上的创举。

但实际的移民发展过程，远没有叙述得这样简单。特别是清朝前期的

^①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上册），江西高校出版社。

^② 曾少聪，前注。

^③ 曾少聪，前注。

海禁政策与偷渡民之间的矛盾，清朝地方政府与台湾居民之间的矛盾，都显示出了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的矛盾。但是清朝后期政策突破了历代统治者的局限，出现了陆地走向海洋的情景。

台湾移民又具其特殊性，相比较东南亚移民拥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不受“弃民”观念的影响。陆海中国对立趋于极致的形态便是统治阶级“弃民”观念的形成。如清朝颁布的限制海外移民归国禁令：

数年以来，附洋船回来者甚少，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全无顾忌，则飘流外国者，心致愈众，嗣后应定义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于外方，无可悯惜，朕意应不令其复回内地。^①

曾少聪先生在《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出，中国海洋移民台湾和菲律宾的动机不同，移居台湾是作长期定居的打算^②，移居菲律宾只是作临时性的居留更多是为了经商，赚了钱以后衣锦还乡。^③而明朝时期，对于西班牙大规模屠杀华人，当时统治者抛出了“所杀华人，多系素无赖，于我国无益，且系久背乡井之人”^④等言论。造成以上结果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自宋元以来台湾已逐渐被纳入中国政治版图，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属于“海外”，使得政府认为有责任去管理；二是从相对人口上来说，南洋的华人人数在当地只能算弱势群体，容易受到当地势力及殖民势力的压迫，而台湾则是以华人移民为主体。所以，与南洋表现出的陆海中国完全对立不同，台湾体现了海洋中国与陆地中国一定程度的融合。

结论

本文分为两章，分别讨论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的嬗变。笔者认为，从大陆自身来说，对于台湾的外交辞令，第一句便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什么是“自古以来”？什么是“中国”？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这背后呈现出的问题

^① 《朱批谕旨》46册。转引曾少聪，前注。

^② 台湾当时已经归于清朝版图，属大清国土，故对时人来说应不算海外。

^③ 相关论述见此书第四章《移民的社会结构》。

^④ 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第48—49页。转引曾少聪，前注。

是，政治中国能否消化文化中国？陆地中国是否等于海洋中国？就目前本文探讨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从“中国认同”本身来看，先秦时代是华人形成之根源，夏夷之变——即谁是中国人的问题——在当时就根本不存在于政治层面，而是文化，更确切说是“礼文化”之中。而从事实角度来说，公元初即出现的海贼问题，则说明中国政治力量不仅停留在中原，中国海洋在此时已经崛起。历届统治者通过海禁等一系列措施，试图把海洋控制在陆地的范畴，都遭到了失败。

综上所述，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绝不应该是领土统一问题，更是关乎整个华夏民族精神内核之传承，中国城邦达于四海的问题。依靠某些说法或某些法理来界定两岸问题，是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需要我们站在 5000 年华夏历史的根基上，用大智慧去解决。

（责任编辑：陈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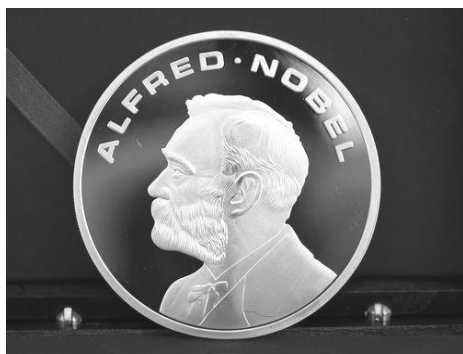


天下/World

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效应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无疑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按照诺贝尔的将奖项授予“一年来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的遗愿，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都牵动的很多人的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获奖者多为在相关领域内的卓有成就者，而且也是因为此奖项往往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是对全人类共同成果的肯定。

诺贝尔奖，是根据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奖项。他在其遗嘱中捐献 3100 万瑞典克朗创立基金，将利息作为奖金，奖给每年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这五个领域内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该奖项从 1901 年首次颁发，1969 年瑞典银行又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诺贝尔奖共有六个奖项，并延续至今。



2012 年 10 月 11 日，北京时间 19 时，瑞典文学院宣布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也成为了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和采访莫言，专家学者撰文以解读，人们也纷纷对此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莫言的著作也在世界多地热销。一时间，顶“莫”、倒“莫”、自豪、质疑的声音在全球碰撞，与之而来的思想、观点交锋也将人们带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中。

墙外花开墙内香

——外国人评的诺贝尔奖，国内媒体趋之若鹜

本来文学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物，何况这个奖还是外国人评的，话说莫言 2011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国内媒体怎么没啥声音呢？至少没什么印象，有也就豆腐那么一块大小，茅盾文学奖可是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啊……诺贝尔奖充其量也就承认了莫言的作品不仅是中国的而且还是世界的尔尔，各大中小媒体居然如此趋之若鹜，我本愚钝参透不了。

——蔡一麟

这种心理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国内不应该过多强调诺贝尔奖，它作为一个文学奖项，有其应有的价值所在，但也不应被过度抬高。

中国文学发展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

历史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应该只体现在政治经济上面，和平年代国家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通过莫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底蕴，树立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新的形象。因此，莫言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世界正在接受中国，而不再是原来纯粹的中国接受世界了。

——章庆慧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乃至中国都不被世界所了解，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着西方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利因素，因此，在中西的文学交流中，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彼此的交流中，中国文学也常常处在一种非常谦逊的地位，这也使得“中国的写作者骨子里非常谦卑”。此外，当今社会电子阅读井喷式的发展也使得传统文学的发展遭遇到时代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人们对于传统文学的热情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传统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被动摇。更多的新媒体和以新媒体为平台的作家的成长，使得中国文学发展处在一种代际转换的时刻，面临

了巨大的压力。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给中国文学创作界一个极大的振奋。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复兴的东方大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主流之外，众多西方人经常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人和事。莫言获得此次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情况。

文学还是政治？

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有一句诗，“Rose is a rose is rose is a rose”，我很欣赏这一句话，玫瑰之所以是玫瑰，正因为它是玫瑰，文学之道亦然。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这是一个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了，文学与道德的辩证关系在诺贝尔文学奖上被炒作地淋漓尽致。在我看来，一个文学的奖项甚至一个艺术的奖项，都不该与意识形态有任何关系。文学的价值标准，不应该被任何政治的外衣所蒙蔽。文学或者艺术不应当被操作为政治的工具，反之亦然。即便是抄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莫言，也绝不是因为个人的行为而获奖，一定是因为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对于一部作品而言，我们鉴赏文字，而不是审查文字，文学奖并非道德奖，这一点毋庸置疑。

——李沁笛

对于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把他与共产党员的关系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挂钩，甚至认为他是体制内作家，获奖是共产党的胜利。这也引发了许多讨论。有些人就认为之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诸如米沃什、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等人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具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因此，此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还有些人认为，莫言抄写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为了借此以达到所谓“加官进爵”的目的，而莫言获奖也会被用来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作家协会具有优越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一种政治利用点。当然许多人也认为上述看法过于解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自己也说，他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他是站在伦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写作。读过莫言作品的人也很清楚，莫言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

骄傲本是自然

我清晰记得我看到这条新闻时的最初感受是同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并非因为我有多么喜欢莫言，我平时甚至很少涉猎他的文学作品，那份最初的感动只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文人。

——高艳芳

很多中国人对于同胞获得世界荣誉很自然地感到骄傲与自豪。面对网上对“莫氏家族”的戏谑与嘲讽，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出于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怪诞心理还是用惯了一切事物皆有联系的著名论断，硬将事情最初的简单重组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猜测。对于此，我们需要用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莫言这次获奖，过度的诠释和猜疑只是又一次在舆论热潮中加入不良的影响。

【结语】

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观点的交锋能体现出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与丰富多彩，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却也能够获得内心的满足与平静。编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奖，我们更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去品读莫言的作品，去理解故事的背景、欣赏场景的刻画、感受人物的描写。莫言面对现代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这一大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了很多不变的东西，比如传统的道德观念，基本的是非善恶，好人、坏人的基本准则等。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农村和城市慢慢合为一体，分不清哪个是农村人、哪个是城市人，所以文学作家的重点应该是研究人。莫言笔下的人物多是农民，但莫言并不是为农民而写作，读他的书的可能是大学老师、学生等各类人群。只有我们从文学角度深入品读并思考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才能够给予它应得的评价。

（责任编辑：柴捷）

话语·幽默 / words humour

如果知道我变得不那么自律了，虚度了被软禁的那些年，他们会很满意，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政治犯中最健康的。

——**昂山素季**近日访美时说。

田忌赛马只是改变了比赛的出场顺序，但马在赛场上跑的时候是全力的，我解释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可以说明我的态度了。我只是对运动员感到非常可惜，真的非常可惜。

——**姚明**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谈到羽毛球国家队队员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的问题。

即使在乔布斯去世之前，苹果就已经开始了转变，它的主要目标逐渐成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模式。然而，尽管乔布斯是个天才，但他也不太可能让苹果最终免于归于平庸。大公司会变得墨守成规，而新的竞争对手则会拿出更聪明、更新鲜的创意，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

——**iphone5**面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切拉**发表看法。

难道我掐死她？

——北京人**廖丹**于1997年下岗，妻子4年前患尿毒症，每月需数千元透析，由于妻子无医保，廖丹无力支付医药费，找人私刻医院收费章，逃费17.2万元，延长妻子生命四年。廖丹在面临审讯时如是说。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关键。对大学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教书育人，然后才是学术研究。特别好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但一般的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这个思路必须明确。目前中国拼命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我看来属于“超前消费”。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近日接受采访时称。

我们正生活在不断加速的矛盾中：我们通讯越多，就越孤独。我们得到一个地球村，却居住在一个毫无生气的死胡同里，以及无边无际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旷野中。

——《大西洋月刊》文章称，在一个充满虚拟社交模式的世界中，我们真实的社会交往却越来越少；欲要快乐，学会忘我，去把网络连接断开一会吧。

曾经，艺术只为被作为艺术来欣赏，而非一种投资；储蓄是为了确保安全，而不是被拿去当作复活节彩蛋珠宝来炫耀；政治是关于议题，而非竞选资金的比拼；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好玩、快乐或只是为了创造美而制作什么东西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

迈克尔·桑德尔认为，过去30年呈现的最重大变化不是贪婪的增加，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向它们原本不该插足的人生领域扩张。

（责任编辑：杨骐铭）



——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这奖对欧盟当前面对的困境来讲用处不大。



南方六省骑行记

吴途勇*

半月骑行，半月修行。彼时的我是一个在路上的人，一个故意的流浪者，一个用单车测量大地和自身尺度的行者。也是彼时起，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真正在我心中渐渐形成。

2012年8月30日从贵州返回到上海，半月的骑行生活弹指一挥间，不久前还那么真实，现在仿佛南柯一梦，遥不可及。若非亲身经历，我难以置信。8月15日到28日，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骑着单车出发，穿越半个上海，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最后抵达“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贵州，行程1700公里。沿途经过6个省，数十个区县，难以计数的乡镇、农村，与许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交谈，有男有女，有些印象深刻，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曾在浩荡壮观的大江大湖伫立，也有在温婉秀气的河流小溪边畅想，有登上山坡一览群山的喜悦，更有骑车转山的挥汗如雨。一路或风和日丽，或烈日暴晒，或阴雨绵绵，不管天气怎样，我都在路上。除了湖北黄石一宿，其余都夜

* 吴途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居小镇、乡村，有正规旅店，更多则是农家小舍。那时的我是一个在路上的人，一个故意的流浪者，我在一脚一脚试着量中国的尺度和自己的尺度。从第4天开始，朋友因身体不适离开，我独自前行，生平第一次长时间单独地身处于万千陌生人的环境中，我无法确知前面会有什么样的道路、天气、意外，今晚我能在哪里歇脚。但我知道，2012年暑假的南方中国骑行，将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这段难忘记忆也将成为我日后战胜困难、实现梦想的力量源泉。

骑行之因缘是本科大四时与好友杜聪聊天，感慨我们心中缺乏对现实的中国观感，常常纸上谈兵，谈价值、思想、理论，读腐了书，因此要切实看看现在的当代中国社会，访访风土民情，好好走一遭，但当时并未说好是骑行，原本定好大四毕业后的暑假进行，可耽搁了。7月底从证大集团与《文化纵横》合办的“菁英计划”回来之后不久，我就与他重提此事，他正在搜狐实习，一口就答应，但他得到8月13才能结束实习，于是我们约定8月15日出发，正好这段时间我还有若干事务要处理。我们分头行动，制定计划，做各种准备。在8月1日决定之后，我立即开始了体能训练，主要是4公里长跑。购车后，从学校到外滩，小试了一下爱车。准备工作还是没有做好，比如修车装备，起初没有买，走之前去买，却已经售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拘小节。我们决定在外地买，可一旦上路，就根本没有机会买。所以整个骑行是没有修车装备的，只有两个备胎、气筒、多用途功能刀。幸好爱车给力，除在4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时的两次上坡，因为我换挡不当，掉链条之外，无故障骑行1700公里，连气都不用加。现在想来，有些冒险。但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准备可能永远会不充分，我们常常在无尽的准备中坐失良机。

万事开头难，第一天要骑出上海市区，到达湖州，感觉最辛苦。在上海境内，我就因粗心大意和操作不当，摔了一跤，连车带人几乎滚到路沟。右手与地面擦成一条长长的血痕，下肢也留下伤疤。那时杜聪正距我较远，四周无人，药品在他那里，只好爬起来继续骑。这是旅行中唯一的受伤，也是好事，给了我警醒，在之后的旅途中，再没有摔过。

从决定骑行，两人同行，到个人独行，最后成功完成计划，确乎是一个逐渐克服恐惧的过程。长途骑行最需要的是决心，对我们来讲，下决心最难，会找各种正当理由、借口，会担心和害怕路途遥远、艰险，会瞻前顾后。但我知道，此事现在不做，可能以后就真没有机会了，而做了则会

成为我一生之记忆与财富。必须放下一些，才能拿起另一些。英国哲学家休谟讲，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正是实现自我追求的那股激情、冲动帮助我下定决心，然后一点点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大胆的迈出第一步，剩下的就是坚持、专注，朝着目标前进。这次骑行教会我，远大的目标能激励斗志，但也会让你望而却步，会打击你的意志。因此每个阶段小目标的实现显得就更重要，小目标容易实现，能增强信心、成就感。骑行路途遥远，应更多关注每天骑行多远。人生的梦想和价值追求，不用时刻幻想和琢磨，更不用老挂在嘴边，一旦规划好，只需要做。

旅途中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危机是第3天，当晚我们到达安徽池州墩上街道，由于连续3天冒高温骑行，杜聪发高烧，39.1度，他告诉我时，我正在写骑行日记，当时就担心他坚持不下去，我在日记中写道：就算是我一个人也要继续骑下去。第二天高烧下降到38.4度，但他决定返回北京，我也担心继续下去他身体会支撑不了，没有更多挽留。没有了战友，剩下我一个人，让我感到了害怕，意志在动摇，因为现在是真的要一个人独行，而不是我昨晚在日记上写写要坚持。但我还是很快就决定继续骑行，危机也是机会，正好测试下自己的毅力、体力。送他到不远的池州市区乘车回京后，我开始了11天的个人旅程。之前的计划都是两个人的，也没有想过一个人完成，而且长途骑行，伙伴是一个精神支柱，现在这个支柱突然没有了，因此打击可想而知。

朋友离开之后，我就催自己赶快上路，因为一旦出发，就会克服恐惧和意志动摇。道路既在动摇你的决心、意志，也在不断强化你它们。在第4天中午，到达安庆，轮渡时，看到浩浩的江水，宏伟的长江大桥，如此大好河山，让我豁然开朗，失去伙伴的阴霾，一扫而光，顿时豪情万丈。我突发奇想，趁艳阳高照，把前一天晚上洗完未干的衣服，放在船舷上晾干。

我觉得骑行中最考验体力的一段是在池州九华山下，离墩上不远，有一段坡路，破山而出，缓而斜，路面平坦，看似应该很好骑。但表象欺骗了我们，路的摩擦极大，使劲全身力气也就如步行的速度，我们像蜗牛一样踩过那段不长不短的魔鬼路。骑完之后，让人精疲力竭、腿脚发软。骑行中，有些道路看似路面很破，路况很差，但骑起来速度很快，也不费劲，让人心情舒畅。从湖州出发，进入安徽到宣城，就如此。在广德县的

乡村坡地骑行，路很窄，也不平，有些是泥土路，但我们如风一样飘过，骑上坡甚至都比上海市区的大马路快。真相唯有体验才能得到。

这次旅行，让我第一次有机会用脚亲身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的巨大尺度和包容性。现代人通常以来飞机、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长距离出行，对大地的体验不够，骑行虽也会浮光掠影，但体验够真实、深刻。从中国最现代的上海，到达落后的中西部，让人印象深刻。一路地形起伏不定，由低到高，经过平原、湿地、丘陵、山地，最后爬上云贵高原东北边缘。有许多高楼大厦，也看到平房小屋，更有摇摇欲坠的木房。有喧嚣的闹市，也有静谧的小村庄。骑着单车，掠过长三角星罗棋布的河湖，跨越浩浩长江，穿过佛教胜地九华山，来到北伐战场贺胜桥、汀泗桥，匆匆而过曾叱咤风云的赤壁，欣赏完“岳阳天下楼，洞庭天下水”，又骑行在美不胜收的珊珀湖湿地，歇息在人间桃花源。快餐式游览了神秘秀丽、独具风情的湘西凤凰，在车上观赏横亘在湘贵之交的中国南方长城，最后在高低起伏的铜仁山原感受速度的刺激。去往凤凰一带的湘西风景值得一提，溪水、河流温婉流淌，碧波如练，真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大地充满灵气，山间还不时涌出哗哗甘泉，渴了就一饮而下，令人回味无穷。



这次旅行，让我体会到了不同省市、城市、乡村，不同的民族、人群、风情、方言。我看到了人们看我的表情、神态，感受到他们对我说话的语言。

气，有惊讶、赞叹、鼓励，也有疑惑不解，还有淡漠，以及善意的责备。有积极主动和我交流的人，有我主动出击才会和我说话的，也有保守不和我交流的，他们或用普通话，或用方言，更多是方言夹杂普通话。在接触的人当中，有勤奋、朴实，有聪明世故，也有愚蠢、狡猾、懒惰。但千万不要低估了任何一个人，即便是愚蠢懒惰之人，也有其聪明之处。他们的有些看法，虽然没有多少理论，但有经验、有其逻辑，不乏真知灼见。

这次骑行，一路上遇到许多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者，还有不明身份的人。有两处值得一提，在安徽，夕阳下，一位穿着简单朴素的类似老农的老汉，像一尊雕像一样，靠在路边的护栏上，目光凝视远方，若有所思，皮肤如同黄土一样，那时我甚至认为他就是黄土的化身。他既像一个典型的乡土农民，又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乎在思考什么，或许什么都没有思考，仅仅是发呆。我从他身边一掠而过，望了他一眼，他眼睛转动了一下，然后继续他的凝视。骑行过去，大热天，我突然感觉身上好冷好冷，还带些惧意，良久才消失，我不知道寒冷、惧意何来。我是因为一个流浪汉身上体现了典型的黄土农民形



象，感到冷和怕吗？还是因为黄土农民身上有着流浪者的影子，让我害怕？还是我怕流浪汉？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流浪汉。至今我不明就里。在湖南，去湘西的路上，下午烈日当空，在乡村骑行，路遇一老妪，穿一身黑衣，拿着一根木棍，在路边寻找什么，我经过她，望过去，看到她的脸，阳光如此强烈，我却看不清，活像鬼魅，我感到可怕而又可怜，寒意、惧意俱上，很久才消失。我是在害怕她的脸，还是我心中有鬼？那时我在想，生活的困苦，人情的冷漠，已将许多人折磨得不再是人，没有了生活的温度。所谓的正常人，就害怕起他们来了，感到冷。我的害怕和寒意，或许正是我的冷漠无情和自视正常。

这次骑行，我会记得，从上海出发时，一位志愿者大妈，对我们的鼓励，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会始终记得在湖北贺胜桥小镇时，住在一对善良热情的老年夫妇家，看我骑行辛苦，老爷爷为我提行李，夜里我洗衣服，主动为我从井里打水，提供各种方便等等，令人感动。我还记得在湖南浪拔湖镇，餐馆老板夫妇，主动为我装满茶水，主动将他们的肉菜分给我，给我打气，让我记忆深刻。在安徽广德农村，停车问路之际，一位老年妇女和她的儿媳，善意地让我喝她们自家泡的茶，我把整杯茶喝完了还不够，加了半杯。在贺胜桥镇，与餐馆有残疾的老板夫妇，听他讲当地的生产生活，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收入。在去梅川镇的路途中，与一回家的妇女，聊起他三哥骑行的经历，在梅川镇路口，与当地的民工愉快交谈，他们为我介绍旅店，告诉我价格，询问我的骑行经历。

这次骑行让我感受到，中国各地虽然有贫有富，地域差异很大，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极大，胡温十年对民生的重视，让农民生活改善不小，人民生活比较安稳，生活水准提高很多。但越往西就越贫困，城镇、村落越来越稀疏、落后，这从各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因此要改善的空间还有很大，落后地区的发展最值得重视和支持。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城镇规划和建筑样式都在标准化、同质化，这方面原有的差别在缩小。但是各地民众所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结构的差异，还是使得他们的意识有不少差别，这点难以具体说明。一路过来，形成一个感觉，乡村社会民众身上普遍缺乏现代意识或者说公共意识，远未启蒙，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民底色还有不少。这样的观感或许与我接触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而较少年轻人有关。未经过论证，我觉得未来十年，国家或许应该更多的重视启发民识，着力培养公民，尤其是在乡村。但反过来一想，当代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又有多少，农村表现特别明显，我自己具备的就很少。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政府几乎没有为我们提供公共空间来展开公共生活，现代公共意识的产生，是通过公共实践获得的。我们落后的文化、思想意识远远未跟上我们日益进步的物质生活，这成为一个基本而突出的矛盾。塑造现代公民之路，任重而道远。

半月时间里，让我看到基层社会比较平静，稍有波澜，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样式、生活圈子，与许多纸面文章、新闻报道不符合。当然这只是我骑行的个人观感，很可能错误，因为虽然骑行可能是一种了解社会的不错方式，但是其实并不能太多的增长你的见识和深度，骑行大多一掠而过，

只是得到一种粗略的感观印象。要想真正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社会还必须进行以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多参与社会实践。同时，必须多读理论书籍，用思想和理论的力量帮助我们穿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虽然已经是研究生了，但这次骑行我发现，自己思想触觉的迟钝和理论认知力的低下，难以想象。我还得学习，要学会在体验中学习。

这次南方几个省市的旅行，让我更深切感到中国社会有很多个世界，每一个世界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这许多的世界交错叠加构成了这个统一的国家。那到底是什么共同的纽带，将这些世界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往我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恐怕不足以解释，因此还需要我深入阅读和思考。

独自长途骑行让我也体验到自身的尺度，一开始真是对身体的考验，但越到最后越是对意志力和决心的考验，你要不断克服恐惧和意志动摇，尤其是要克服可能出现的对骑行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怀疑。半月骑行，半月修行，浮躁的心，似乎开始沉下来，让我更能看清自己的心，更加明确了未来的方向。骑行生活正好应了日本电视剧《坂上之云》中，秋山好古所说，男人的生活要简单、明快。我每天过着自高中以来最为规律、简单的生活。早上6点钟起床，洗漱，收拾行李，看地图，吃早餐，7点多出发，风雨无阻，边走、边看、边想。中午趁午餐稍事休息，继续前行，晚上6、7点左右找到住处，洗澡，吃晚饭，洗衣，看新闻，或者看看书，9点以后开始写日记，10点就准备睡觉。骑行很累，时间紧张，几乎没有时间看书，也为轻装简行，我只带了一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居然读完了这本薄而经典的著作。

一个人单独骑行有较大风险，我除了在上海时摔了跟头，没有出现其他意外，幸运至极。由于害怕父母不同意和担心，事前没有告诉他们，等我安全回校之后告诉二老，他们对我一阵严厉批评、指责，我的百般解释，毫无用处，第二天他们又相互责备，怎会生养如此儿子，气得1天没有吃饭。现在回想，对于父母，愧疚至极。于这个世界而言，我不过就是沧海一粟，一粒尘土，但对于父母，我可能就是他们的世界。

半月的骑行生活，让我在心中逐渐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而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冷冰冰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但并未成型，但仍需要我以后不断的前行、实践，来慢慢丰满和充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独家风景

张玉瑶*

我坚信走路的意义，用自己脚步一步步丈量过的土地，一定会比坐在车上更为精确一些。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所谓旅行的意义。想到这里不由微笑了，我多么感谢我有一双能走很远很远路的腿和一颗想走很远很远路的心。

华

灯初上时的公交站，疲惫地被挤车的人流向前推着，在投币箱前略略停留，于是两枚硬币在箱壁叮叮当当地一路滚落下去，还没来得及听罢回音，又已经被人群向前推去。没有座位其实没什么关系，我是站惯的人，然而当然有座位更好，而如果是靠窗的，那真是别无所求了。刚走了二三十里路的腿脚坐下才发觉僵硬，但头靠在窗上，看着夜幕里陌生的城市一盏又一盏的灯亮起，竟有了温暖安心的感觉。

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漫游的这十多天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疲惫，但温暖安心。

好像是第一次这么久地游荡在家和学校之外，这些天里有不少时候有朋友相伴，但也有不少时候是一个人在路上，拖着一只不算重但也不算轻的箱子，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再从这个城市的火车站奔赴地铁站或公交站。南方人喜欢用硬币，因此这些日子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总有许

* 张玉瑶，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多用来坐车的硬币相互碰撞着叮当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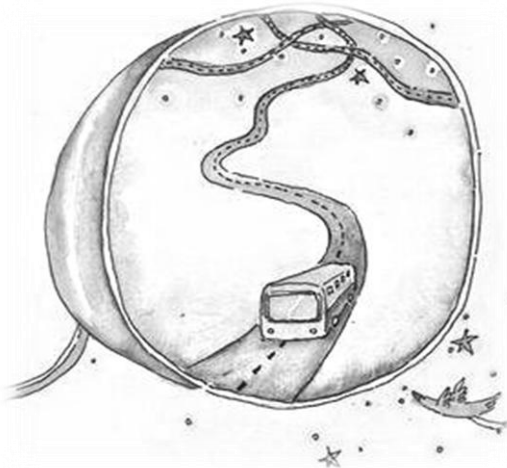
我是个很没方向感的一流路痴。我还是个头脑经常短路转不过弯的愣头青年。所以当在厦门和朋友分别，即将独自踏上旅程的后半段时，她们有些担心地问我，你一个人行么？我使劲点头说行，仿佛是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安心一般。出发前曾兴奋地告诉父母我的计划，没想到计划中不停变幻的城市和车站名字让他们很是迟疑担心，我争取了很久才获得独自上路的许可，绝不希望这段行程最终成为对他们所担心内容的确认。其实我没有办法说绝对铁板钉钉没有问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去完全陌生没有任何认识的人的地方。从乌镇去上海其实有很多种方案，但为了尽早到达，我先是冒着险赶到汽车站买到五分钟后就要开的车票去嘉兴，又冒着险坐公交从嘉兴汽车站赶到高铁车站，最后冒着险买到了二十分钟后开的动车票——再晚就没有动车了。相比起其他事先买好火车票硬性安排好时间的旅程，这一段无疑显得很冒险，其间并无十分把握，若是哪一下耽搁了，或是没了票，我便不知何时才能到达了。但我终究还是冒着险完成了，踏上上海的土地，那一刻是难以描述的安心和得意。

我喜欢这每一次或许无法精准的出发，但我更喜欢每一次更加无法猜测的到达，明明抵达的是陌生的地方，却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乌镇没有火车站，去那里需要先从杭州坐火车到桐乡，再从桐乡坐班车。我一个人坐在大而空荡的桐乡车站等车，略略僵硬的腿搁在高高的箱子上，看着薄暮的天色渐渐变暗。不远处被我婉拒掉的出租车司机看着我大大咧咧的样子，但我并不在意，倦行人只是想短暂地休息一下。远方有一块路牌，左转去桐乡乌镇，右转去海宁，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就这么和王国维与徐志摩擦肩而过。车来了，我第一个上车，女公交司机问我，你是去乌镇？对。这时上来一对恋人，他们向她打听路线，女司机描述一番后向我确认，对吗？原来我的样子看上去是个归人而非游人，但我的确喜欢他们错把我当成归人，初来乍到便获得认同感是件美妙的事情。我歉意地笑笑，我也是来玩的。她睁大了眼睛，你一个人？对。她笑着说，现在好多一个人来乌镇的小姑娘啊。我也笑——我其实是第一次当这样的小姑娘，但我没说出来。

在路上的时候，能坐公交和地铁我就不打车。自然是为了省钱，因为我是个穷学生，也因为路程实在太长，只要时间赶得及，两块钱能做到的事我一般不会用二十块钱去做。而且我从性别上说到底是个女孩，至少我

父母认为我是个女孩，因此虽然我觉得自己在性格某些方面常有男孩的特质，但陌生城市里公交车外慢慢吞吞移动的路灯光比起出租车外瞬息闪过的霓虹灯更让我安心。而如果能坐公交，我就不坐地铁。我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看看这个城市。

住在这个城市的不少人都告诉我們几乎不坐公交的，理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些：难等、慢、堵车。可我还是坚持，我不想在穿越这个城市的时候只看到它和别的城市没什么两样的地下铁道的模样。绿灯，红灯，走走停停，我并不着急，始终靠在车窗上看除去旅游景点之外



的这个城市是以怎样的日常形态存在的，每个地方的空气都是不同的。郁郁葱葱的榕树和写着沙茶面的招牌，那是鹭岛。抽嫩芽的柳树和刚出笼青团的清新气味，那是杭城。因为太多所以不免会乏味的高楼和大俗亦大美的霓虹招牌，那是沪上。张爱玲写的伸出手去摘树叶的举动也是只有在双层巴士上才做得到的，这便是公交的乐趣。上海的地铁格外发达，人也早已成了习惯于地下穿行的生物，我则坐着绕行的公交，从浦东到静安，从虹口到徐汇，在有限时间里选择长长的路线，看尽可能多的城市风景。自然是绕了路，也自然是花了更多时间，但我实在喜欢这点浪费。为了能看看跨江的桥和桥下的江，我反复查询着可以不坐地铁的路线，不顾车上上海姆妈惊诧的眼光，左右转着头在一座桥梁的长度上争分夺秒去看黄浦江水从脚下流过，稍远地方是午后日光里的世博会中国馆，再远地方有一片大厦逐渐隐入地平线，那一瞬间我悄悄将这刹那风景收进私家珍藏。

而如果能走路，我就不坐公交。在绍兴清晨的鸟鸣声中醒来，偶尔看到一篇写八字桥的文字，临时决定我要去那里看看。离住处有一段距离，但我还是走着去了，一路看到的都是这个古城渐渐醒来的模样。路边吃早餐的人，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学生，正在开门的邮局，戴着乌毡帽走过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像电影的摇镜头，一直摇到八字桥上早起扫桥的清洁工，摇到桥下乌篷船里捞拾水中漂浮垃圾的老爷爷——我正好碰见了他们在

做的这些动作，碰见了正好在做这些动作的真实的人。我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来来回回走着，直到最后坐上去火车站的公交。似乎能去更远地方的是车，但能去到更多的地方的，却是人自己。把这些路线连在一起了，那便可以比车去的地方更远。正如同血液，不仅流在大动脉里，也流在离心脏很远的手指尖的毛细血管里。在北京住了快四年，我也不敢说我触摸到它布满灰尘的皮肤下几寸的距离。而这段旅行，到每个地方只能停留短短两三天，自然只能接触到这个陌生城市最最表层的东西，还只能是以最最浮光掠影的方式，因此总是存在自己看到的城市和之前在宣传册和别人的旅游攻略上看到的城市相差无几的危险：所有人看到的厦门都是小资的，所有人看到的杭州都是从容的，所有人看到的上海都是繁华的。所以我坚信走路的意义，用自己脚步一步步丈量过的土地，一定会比坐在车上更为精确一些。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所谓旅行的意义。想到这里不由微微笑了，我多么感谢我有一双能走很远很远路的腿和一颗想走很远很远路的心。在漳州塔下村，带我们参观的土楼楼长问我们走路还是坐车，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地说我要走路。从乌镇汽车站出来，马上有三轮车夫迎上来问我去哪里，我摆摆手说不用了，他一直不甘心地追了好远的路。我很真诚地说，我真的是走惯了，我喜欢走路，您还是回去吧，不要耽误了生意。

绕着整个鼓浪屿走。穿过整个客家村庄走。在乌镇的青石老街上来回反复地走。完完整整走过了白堤、孤山和断桥，走遍清河坊。走完了整个南京西路和南京东路，还一路拐着弯穿越了周边的大街小巷，看见弄堂就要就去走一走。漫长的步行总是带给我许多惊喜甚至惊艳，我无法忘记站在早晨八点的八字桥上朝两边望去时我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之声。那是一片无人打扰的水乡，两个老年妇女坐在黛瓦白墙的门前吃着早饭，一个蹲在河边石阶上的大妈在水中洗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一个大爷在自家门前的炉子上生火。大概注意到有人无所事事在河边闲逛，他们抬起眼睛看一眼我这个面生的人，又低下头去干自己的事情。在越来越被程式化的旅游中，旅行几乎等于拍照，那些长枪短炮是一个外来者对异乡的强行介入，本身便是陌生化的过程，而我们却倾向于将此审美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意义。我根据以前经验理所当然摸出相机时，却忽然感觉到空前的不好意思，在这个如此本乡的地方，如此这般，我这个外乡人的身份是不是太明显？——我还是第一次有过这种不好意思拿出相机的旅行感觉。鼓浪屿某个民居区骑着自行车并连续不断摁着铃轻捷飘过的闽南男孩，漳州塔下村

缓缓用手划拉着晒在晴好阳光里的笋干的客家妇女，西湖边某个清静角落里的一片薰衣草丛，上海某条细窄弄堂里一边吃青团一边高声用上海话交谈的女人们，如果没有步行，我不可能遇见他们。我用新奇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也绝不会多加理会。这就是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不是做给游客看的，我只是在某个未知时刻轻轻从他们惯有的生命旁边短暂经过。每一条我走过的街道，都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独家风景。甚至也不属于我，只



是那一刻的一期一会，下一次去我看到的人和城的情态必不是当初所见。就像在乌镇，整个旅途中日日天气晴好，唯有在乌镇一日江南细雨迷蒙，水乡又逢雨天，上下一水，我总感觉是种缘分。缩起裤脚，湿着鞋袜在青石板上行走，雨水落在屋檐复从檐上滴落石板的声音在安静的雨中听得清晰。即便再去，这种情景和看景的心境不一定再会复现了。

我不敢说我看到了多么真实和多么全面的城市，但就我看到的那一面，它是真实的。就比如厦门不全是文艺和小资的，遍地的廉价美食和光着膀子聚在一起打牌的鼓浪屿男人们让我看到它也有极端世俗的一面，当然这里的世俗绝不是个贬义词。杭州也不全是从容的，蜗牛般行驶的车辆让我在开车前二十分钟才赶到火车站，于是不能不发现这个城市的拥挤和焦虑。而在上海，我不能免俗地去看了那些著名的高楼大厦，且仍未免俗地去数那些楼层，为它们在黑色天幕下呈现出的绚丽灯光夜景发出由衷的惊叹，因为它们构成了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平地而起的海上奇观的重要标志。或者

从哪个很大程度上，我是去看看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的魔性在哪里，这些都算是注脚吧。但我总觉得这些都市景观离我太远太远，它们入云的高度不是我能评价的高度。直到某天在穿弄堂时，看见一根粗大的竹竿斜斜撑了出来，上面串糖葫芦一样串着褪色的衣服和看不出颜色的围裙，而远处的背景正是那李天王的塔一样的金茂大厦和啤酒瓶开瓶器一样的环球金融中心，整个画面让我想起电影《马路天使》的开头，镜头从高处一路下落、落、落，落到最普通的弄堂人家。又想起穆时英那著名的一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如今该是没有那样极端，上海终究把它们调和进了一幅画面，这当正是其魔性所在，这当是一个更为全面完整的上海。我的独家上海。

我走的时候，北京还是冬天。我到南方，和春天一起北上，一路都是春。回到校园，发现银杏亦开始生长新芽，而玉兰花已开得正好。比北京更加靠东，那里的天亮得很早。在我醒来之前便有鸟儿醒来，窗外是黎明的小谣曲。青白的天色里，我自然而然地睁开眼睛，看一眼相比起在北京过早的时间。虽然前一天同样走了二三十里路，但每天如此，依然早早地醒来，准备走新的路程。拉开窗帘，早晨的风还有一丝轻寒。我决定快些出门，看看这个城市怎样醒来，这一刻是我的独家风景，我知道，到华灯初上时，收获的依然是温暖和安心。

（责任编辑：崔攀）



中国印象

“甲方乙方”：中国式梦想

董成龙*

冯

小刚《甲方乙方》(1998年春节上映)掀起了贺

岁片的风潮，每每观看都能为之一笑，但叩问意识形态，冯导此番，恐怕并非为拍摄喜剧或商业片而来。

几个赋闲的演职人员组建“好梦一日游公司”，它不是黄粱梦游，亦非片中暴发户所讥讽的骗钱的“好蒙”（显然，梦与蒙有时很难辨清——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别）；它关注的是希望（片中办公室墙纸贴着“希望工程”的海报便是佐证。在电影有限的视听叙事中，一位杰出的导演必然将主题展现于影片的每一个细节中）。

公司的最初宗旨是，“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但经历了卖书人的将军瘾、厨子的英雄想象后，经理钱康（冯小刚饰）提出了“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钱康的自问自答让所有中国人感到似曾相识：“所以我们要纠偏，我

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这项事业让他们“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

整风宣言发出后，影片叙事出现两处转折。首先，公司不再面向完全脱离实际（可行性）的所谓梦想（幻想——卖书人在和平年代的将军瘾，厨子对人人皆可成英雄的大平等想象，这当然称不上“希望”）；并非所有对未来的想象都可以称作“梦想”，也就实质否定了最初的宗旨——“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第二处转折更进一步：在乙方对甲方的在世契约许诺中，梦想不能丧失可行性（如苏联教科书中解释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月亮上吃菠萝”），应是可以等到的未来现实，因而好梦一日游公司所要迎合的趣味就变成了“过日子”中的“希望”（如余华《活着》）。因为平凡日子中的希望不是虚妄的，所以它不会在一日内实现又再次陨落（卖书人对一日梦游的狂喜与遗憾），整风后的公司重新复归到“希望”的核心原则上来，梦想成真的实现过程也从一日转变为数日甚至数月，从而它的实际意义可能伴随一个人的物理生命和精神生命（接下来的五个故事都与之前的

* 董成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两个故事有本质差别)。这样下来,当然是“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因为这种精神的践行,或许正是大国应有的政治成熟,它是对乌托邦的追逐,而非对意识形态的迷信。

姚远(葛优饰)对一位出于好奇、觉得好玩的应聘者的拒绝,与整风精神相契:“你这种动机是有问题的。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是一件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痛苦之上的工作,是把爱和欢乐传递给人间的天使,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付出自己的一切。”(整风后的五个故事都要求“付出极大的艰辛”,远没有整风前的两个圆梦任务好玩)“梦游公司”所传递的这种欢乐,显然不是意识形态的狂想曲(唱红),而是平凡日子中的希望。可以将提供这种欢乐的人喻为天使,但他们未必是完人,绝对可以是姚远自评的“四六开”,四分缺点、六分优点的人^①他们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②,这样的人当然深得民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国家应重点保护这种

^①中国人熟悉“三七开”,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灾害)、“七分成绩、三分问题”(评价毛);但却很难承认三七开、甚至四六开的人,有这种付出极大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痛苦之上的“动机”(政治觉悟);因而,要么是出现人间神,要么是出现虚无主义的大平等混乱,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②有趣的是,古典时代“知识即美德”(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现代早期“知识即权力”(培根),当代“知识即财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身位的下降过程,也是这些人逐渐面临绝种的过程。

濒临绝种的人。他们就是那位厨子所不能理解的“英雄”,他们真就“不是一般人”。^③

甲方乙方是在世社会契约,试营业的好梦一日游公司以这种方式“填补了服务行业的空白”。有趣的是,提供服务满足公意(provision of public good for general will)、满足民众的日常希望,本是国家机器作为乙方的题中之义,反倒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周年祭时由这些无业游民当成事业来做,他们好像有孔颜之乐(“不要工资”),甚至要将这项重大的政治性活动办成“慈善组织”。

显然,除了发展这项事业,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几个赋闲的演员恐怕再也找不到别的生计。不过,他们去做“大写的人”(柏拉图《王制》言人与国家同质而有小大之别),无论对于他们本身还是对于国家都太过沉重(国家失格才会有替天行道)。

好梦一日游公司在整风后叩问终生梦想何以实现,穷其根本,是在叩问华人中国式梦想何以实现。冯小刚的影视叙事已给出了答案:甲方乙方的社会契约,正是中国式梦想。

(责任编辑:李沁笛)

^③可惜的是,崇拜英雄和影片办公室墙上锦旗的出场,恰恰建立在英雄作为历史断裂这一基础之上。与此相对应,也极为反讽的是,有一种人、一种力量倒是子子孙孙无穷尽(试观《阿Q正传》)。

外面的世界

——电影《暖》随想

陈安龙*

电影《暖》改编自莫言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这部小说有别于莫言以往作品中的阳刚与粗犷，散发着一股细致、阴柔的魅力。而更让人感佩不已的是霍建起导演竟将故事内涵冷冽、残酷、撕心裂肺、让人心碎的小说，透过他散文化的影像风格、娓娓道来的叙事特点巧妙地化解为对于过往的追寻。一切的残酷在电影中似乎都变得纯净和温情起来，让人在清雅苦涩中咀嚼出一股幽幽的淡香……

故乡的水土与外面的世界

出生在原籍老家，呱呱坠地之后，生命就与那块土地、那方水土血脉相联了……然而，生命在躁动中，生长着希望和寻觅。稍长之后，远行的期冀、负笈求学的热望、文化的诱惑，生命的底色上在不断地涂抹着、变幻着。生命被创造出来之后，既有坚执的笃守，又有无定的



漂泊，更有苦苦的追寻，生命的一端连结着故乡那方水土，一端又同现代文明的风景接通。^①《暖》的故事正发生在这两个世界的碰撞当中。当外部文明世界（城市）的触角渗透进这片宁静祥和的乡土时，暖的心便被搅动了，出走（走向新世界、外面的世界）成为她生命的主题。而作为乡村中最美丽、活泼、清纯、能歌善舞并且怀揣邓丽君梦想的女孩，暖似乎也是最有资格率先走出去的人。但暖却将这种离开更多的寄托在别人身上，从小武生到井河，所以她一次次的等

* 陈安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①参看王必胜《浮生札记》，载：《青年文学》1995 年第 12 期

待，一次次的失望，最终成了残疾，被迫与哑巴这个自己最讨厌和害怕的人厮守一生。那个出走的梦想只能成为午夜梦回时心酸的回忆，而影片延续暖梦想的就是她的女儿，小女孩对外面的一切都很好奇，而哑巴似乎也看到了母女身上传承的这种东西，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幕让观众落泪的单纯想将母女俩推向外部世界的举动。

一个忏悔者的独白

我是井河，从考上大学的那年算起，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回来了。家乡，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却已经成了外人。每条路都还铺在原来的地方，仿佛在等我，等了十年，这让我的心中无端地有些惭愧，不知是因为离开得太久，还是因为这次回来的如此匆忙。

而暖的出现似乎给了我答案。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乡，我不敢，我怕见到她，我更怕见不到她。那天，我们终于在故乡小桥上不经意地相遇了。桥是个通往彼岸的事物，桥的那头连接的是什麼，不到桥那头谁也看不明白。十年的折磨，十年的思量，十年人生的思索。如今在桥上，现在的桥，能通向人生的何处，我也不知道……但那个瘸了腿，背负着重物、沉甸甸

生活，有个哑巴老公的村妇暖让我心如刀割。人生恨不如初见，作为一个对过往的忏悔者，我无从辩解，只能将我的故事作为献祭的牺牲，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我跟暖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读书，我愿意跟暖在一起，每次放学的路上，我就在心里唱歌。奇怪的是，过不了一会儿，暖也开始唱歌，而她唱的经常就是我已经心里唱了半天的那个。这个现象一直让我觉得很神奇，或者说就是这个神奇的现象给了我无穷的自信，大胆地把这个方圆百里又漂亮又能歌善舞的女孩当做自己理想的恋人。但是从省城来的剧团打破了这个好似与世隔绝的乡村的宁静，也打碎了我对暖的梦。这个外来的剧团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村的老老少少，就像剧团没来之前村里的秋千一样。问题是，有些东西被吸走了就很难拿回放回原处。暖的眼睛便黏在了剧团一个漂亮的小武生身上，再也无法让她移开。后来剧团走了，小武生也走了，只留下了一面镜子和一句“会回来接她”的承诺，便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消失了。我当时真的希望暖可以和剧团一起走，我受不了她失望的样子。如果我是小武生，拼死也要带暖一起走，可是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

暖，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意思，我和她一起失恋，一起痛苦。终于，借助飞扬的秋千，我终于第一次有勇气向暖表达爱情，秋千成全了我的勇敢，掩盖了我的惊慌，夸大了我的力量。真想就这样永远荡下去，那是一次真正的飞翔。而暖也答应我只要我考上大学便嫁给我。但是，之后，真正的飞翔戛然而止，只留下残疾的秋千和残疾的暖。我如愿地考上了大学，带着暖的梦想离开故土进入外面的新世界。我曾如同小武生一般承诺一定会回来把暖接走，带她实现梦想，进入新世界。但我慢慢习惯了城市生活，也有了更多我以为重要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对暖的想法，也使我无心顾及暖的等待。后来收不到她的回信，我知道暖是怕被拒绝。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许，希望她真的不再来信，然后我就真的轻松了，就再也不想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了。现实的环境改变了我，让暖经历了又一次没有结果的等待，我答应回去接她，可是我没有，这一过就是十年。

曾经的暖，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散发着光芒。但是如今的暖身上已经很难见到什么色彩了。但是暖并没有完全的被黑暗埋没，也许是因为有哑巴。在暖的家里总会有盏不是很亮的灯，这盏灯就像哑巴照亮暖一样，虽然不会很亮，但不至于

被黑暗吞噬。

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人都会做错事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如此说来，我是幸运的；我的忘却就是我的怀念，一个人即便永不还乡，也逃不出自己的初恋，如此说来，哑巴是幸运的；我的忧虑就是我的安慰，哑巴给予暖的我并不具备，如此说来，暖是幸运的。

别处的生活与失败的出走

村里荡了不知多少年的秋千，村口涓涓流淌的小河，随风徐徐飘动的芦苇絮，蜿蜒的乡间小道，金黄的稻田和草垛子，热闹的麦场，纯朴的民风……我是暖，这就是孕育和滋养我的地方，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乡村。但我不想一辈子困守在这个狭窄的世界当中，我想走出农村，走向外面的世界，那才是我生命的归宿。

梦是美的，但如秋千般，终是会停的，会碎的。那个省剧团的小武生和与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井河都曾承诺把我接到外面的世界去，但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而我，因为希望，所以失望。记得有一次荡秋千，我问井河他看到了什么，井河说他看到了稻草堆的尖，看到哑巴在翻晒稻谷，但我告诉井河在秋千上我看到了北京，看到了

天安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宿命的力量吧，最后的现实证明了我们俩相互替对方看到了未来。多年以后，井河将替代我走出山区走进北京，而最惧怕哑巴的我注定与哑巴打后半生的交道。还有那次，我去给心爱的小武生送豆子，而追赶我的哑巴是要给他心爱的暖送鸭蛋。你等待的人从不来，来的人从不是你等待，过去与现在，责任与背叛——世事总是这样交织循环，不尽如人意。循环的爱，循环的诺言，循环的等待，以及循环的失望。^①

这，应该就叫命运吧。我的命运一定已被锁上锁链，所以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挣脱它的束缚，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终究只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梦，我的身体和灵魂都被折磨地破碎不堪，我已经倦了，不由得想起了当年为了到县里演出而向父亲求购皮鞋反而得来一记响亮的耳光。暖，不要再做梦了……但那双井河从外面的世界寄给自己的，也被自己珍藏十年的皮鞋又代表了什么呢？

尾声

或许暖的这种出走，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原始到现代，是人类

无法更改的必然之旅。井河十年之后所回归的“乡土生活”不管有多唯美、浪漫、舒适、美好，可能最终都得在强势文明压迫下消逝、甚至不留一抹烟痕，但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系一种纯美的生活方式，不要将两个世界完全割裂，是我们应该透过《暖》反思的问题。否则，被两个世界撕裂的身体和灵魂都破碎不堪的又何止暖一人？

莫言的小说，透着生活的厚重、沧桑、悲痛。而霍导转化成电影，则更多了些积极生活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声称的“我希望在悲之中有美好的、温暖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只看到恶的东西，就会太绝望了。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能客观地看世界，客观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并化解你所遇到的不如意，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你会在平淡生活中寻找到一种快乐。我不否认美化的倾向。我是个心很软的人，没法面对生活中太多残酷的东西，因此宁愿把环境营造的很美好。”带着导演的这种观感重新体味一下这部电影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责任编辑：李沁笛）

^① 参看梁明《回忆碎片：一块冷一块暖》，载于当代电影 2004 年第 2 期。

专题报道

第九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



2012年9月10日至14日，第九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我院举行。本届研讨班以“共和主义的思考”为主题，涉及的议题包括“1792年9月革命如何发展为共和？”、“1911年中国：建立共和”、“第五共和国：50年法兰西政治史”、“瑞士的共和思想发展与继承”、“共和与殖民”、“瑞士的公民身份以及国籍政策：20世纪转折时期的共和主义潮流”。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青年学者及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历史系、政治学系等院系的研究生共60余人同1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为期5天的对话与探讨。

巴黎政治学院的让·弗兰索瓦·西里奈利教授发表了题为“第五共和国：50年法兰西政治史”的演讲。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西里奈利教授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都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注重史料的性质；第二，在方法论上注重对历史史实的把握；第三，不局限于重建历史语境，而应重视这一重构的意义。基于以上三点，他展开了对第五共和政

体的性质的阐释。他将政体作为一种有机体，并借用了政治体制的“新陈代谢”这一生物学的术语，即将政体视为一个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

作为政体，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都持续了相当短的时间。第三共和是一个持续、稳定的政体，因为这一政体符合宪法，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如此形成的体制对公民社会有一种亲和力。第三共和政体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由于对该体制的认同而在战争中坚持下去。第四共和政体经历了非殖民化的进程（Decolonization Process），这对共和政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第五共和政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媒体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过去政治竞争的主要对象是意识形态，而在今天的第五共和政体中，图像和声音成为竞争对象。由于媒体层出不穷，民众的舆论和舆情变化很快。

我校副校长范军、法兰西学院院士玛丽安娜·巴斯蒂女士、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端木美会长、法国驻上海领事馆 Emmanuel Lenain 总领事、瑞士驻上海领事馆 Heinrich Schellenberg 总领事、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Hugues Tertrais 教授、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等出席了开班仪式，并先后在仪式上致辞。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复旦大学的李宏图教授与来自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于格·戴和特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致辞，对为期五天的对话和讨论做了总结。

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由我校联合法国人文之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于 2004 年创办，法国蓬杜瓦兹大学和瑞士弗里堡大学分别于 2008 年、2009 年加入。

该研讨班旨在加强中国与法国、欧洲学术界的联系，推动中国对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国内中青年学者提供国际交流和接受短期教育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培养新型国际化史学工作者。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国际交流处和研究生院已经连续 8 年承办了这一活动。

聚焦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



【编者按】金秋九月，硕果飘香，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于2012年9月15日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湖北等地多所高校的19位研究生代表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承办、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协办，在为期一天的论坛议程中，参会代表围绕“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与政策”这一主题分四个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对于这次难忘的学术体验，与会者们有许多特别的感悟，部分与会者将在此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论坛经历与心得体会。

会议综述

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与政策的研究生视角

姜忆楠^{*}

2012年9月15日，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沪地

^{*} 姜忆楠，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9级本科生。

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与政策”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多位青年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代表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并就“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对外行为”、“国际秩序与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与调整”、“东亚研究：理论与现实”和“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探索”等专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对外行为

会议从文化、受损国家身份、身份认同、错误知觉和联盟瓦解的原因等方面探讨不同国家的对外行为与规律。

与会代表提出，俄罗斯的帝国意识造就了其浓厚的后帝国怀旧情绪，形成了目前俄罗斯外交的东方向度。国家存在双重身份，国家实际具有的身份和希望表现给他国的身份的差是国家的受损身份。英国在是否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因自身的国家身份受损而进退失据。身份的建构依赖社交圈对自身国家形象的反馈。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外界给予的不同反馈而混乱，中国因此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身份，进而无法制定出明确连贯的外交战略。卡扎菲政权由于在处理国内问题与外国干涉时频发错误知觉而迅速败亡。经过严格的定量检验，联盟的瓦解受到共同威胁、冲突历史等因素的影响。点评嘉宾和评论人认为，与会代表的发言视角新颖，引用的大量文献体现作者为论文的写作付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因果关系和论证上还没有完全阐释清楚，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部分不符合原文理论推导的案例指明了修正理论的方向。

（二）国际秩序与美国外交政策：变化与调整

会议讨论了国际经济和安全秩序的新动向，以及美国外交的“伊斯兰恐惧症”和自由国际主义全球战略思潮的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主权债务形成资产专用性推动了主权财富基金的形成，战略性投资是用纵向一体化来取代市场以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但根本解决措施尚不明朗。2010年以来中东国家政局的不同现象可以用不同类型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来解释，中东非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府绩效和民主选举，而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则来源于宗教价值和王室统治的传统，但部分论述还不详实，民众对老人政治的厌恶等变量尚未控制住。以大萧条和二战为起点，美国一系列的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为

日后美国霸权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在美国国内经济疲软，债台高筑，失业率高，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分析美国全球战略思想，对我们认识和应对美国全球战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具有重要意义。点评嘉宾认为，论坛的形式平等，所选论文均属研究型论文，观点鲜明，文献量大，逻辑性强，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可以细化，在论证上需要更加严密。

（三）东亚研究：理论与现实

会议探讨了东亚未来发展的经济、安全和制度建设，以及东亚国家的对华现状。

与会代表探讨了包容性增长作为东亚未来经济繁荣之路的可行性，但这种增长需要具有中国特色，而非欧洲式的包容性高福利政策。历史的记忆作为东北亚国家认知的起点，各国认知的类比导致认知误差，从而无法形成统一的认知预期。未来的集体认同形成需要东北亚的情感性情感转向工具性情感，但外生性原因同样不可忽视，且东亚集体认同的含义尚不明确，战争的集体记忆并非不可克服，欧洲就是一例。另一种观点认为，东北亚存在安全与发展两种思维交织的五种思维组合，包括安全思维的交融、安全思维的冲突、安全思维与发展思维的冲突、发展思维的交融、发展思维的冲突。未来中国的思维是安全与发展的结合，应该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国的发展思维，但东北亚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相互影响，并非如此简单，且案例论证需要依据因变量而非自变量，论证需要更加严谨。会议还讨论了东盟安全共同体尚未形成的原因，有代表认为这是因为缺少地区主导国家，后者可以主导东盟制定地区规范、承担东盟制度改革成本以及形成东盟的后天性认同，美国虽然会对东盟安全共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但是不会成为安全共同体主导国，但美国在共同体中的作用以及主导国与共同体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梳理。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包括安全与经济两维，通过对东南亚各国安全与经济指标分别进行赋值，可以得出东南亚各国对华战略的二维坐标，从而确定其对华战略类型，这一想法还需要考虑不同国家对华战略所处的时间段和涉及到的议题，最终明确其规律。

（四）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探索

会议讨论涉及中国的历史经验、央地关系、边疆安全、区域治理、G20的缺陷与改革等议题。

与会代表用数据统计方法对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也是崇尚实力外交的国家，并不是“例外”的，但在具体解释上还需要明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央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地方经济权的放开为地方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提供了平台，但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及相互关系仍需进一步的探讨。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借鉴的具体形式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近年来的边疆存在部分边界领土主权未定性、少数民族问题和特殊的边域社会形态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化合作、参与创设地区合作组织、开展多边主义外交和建立地区区域治理机制，但仍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地区主义。“湄公河惨案”使次区域的治理问题凸现出来，非传统安全成为国家间合作的新领域，加强次区域的国家间合作与治理的研究对于中国参与地区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如果能选取更小的角度进行研究应该能有所作为。

总体来说，与会师生认为，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对于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水准、为中国国关研究储备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能将这一交流机制和交流平台常态化，对促进中国国关学界学术的交流和砥砺功莫大焉。



参加“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随想

吴途勇^{*}

初秋时节，时隔一年半又来到天津，与前次访故友不同，这次的行程是为参加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作为本次论坛协办方代表来参加论坛，我真的感到荣幸之至。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二届论坛比起第

^{*} 吴途勇，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生，华东师范大学《闻道》杂志社主编，“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参会代表。

一届，影响更大，吸引了更多的研究生同学参加；同时，覆盖面更加广泛，准备也更为细致周到，这使得论坛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生界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因此要衷心感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和“新视界”团队为论坛的成功举办做出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扎实且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本次论坛就不会如此成功。作为协办方，“闻道”编辑部也非常感谢来自各个高校的研究生对本次论坛的支持，因为是你支持了论坛的成长。从2011年第一届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顺利开幕，到如今的第二届论坛圆满闭幕，这个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生自己的论坛，一直在茁壮成长，大步前进，虽不能说完全成熟，但运作模式已经成型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闻道》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新视界》编辑部是这个论坛的主要发起者，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的发展，也见证了这两份年轻的国际关系研究生自办学生刊物的成长历程，同时，两家刊物的合作堪称典范。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分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对外行为”、“国际秩序与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与调整”、“东亚研究：理论与现实”和“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探索”等几个分支。来自全



国十几所高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围绕这些话题进行了有益而深入的讨论。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但因为都热爱国际关系研究，所以见面并不感到陌生，甚至还有久逢故人之感。是这次论坛让我们有机会通过知识和思想的交流

成为好友。在我看来，天下事最开心莫过于与一群志同道合朋友一起论道了，也莫过于通过思想的交流找到朋友。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在交流、甚至是交锋中，日益精进，我们共同的友谊也愈加深厚。这次论坛，还让我感受到了国际关系界的生机与活力，有这么多青年才俊投身于国际关系研究，在认真思考中国与世界政治这样的大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大有希望。

从我个人而言，不仅获得了友谊和知识，还开拓了视野，我原本非国

际关系专业出身，因此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国际关系时，对这一领域并不是非常了解和熟悉，视野也非常狭窄。这一次论坛，让我看到了大家都在关心什么问题，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做什么样研究和已经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让我了解了更多分析世界政治的视角、方法，从而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在当下世界的处境。

中国历史性成长下的世界秩序构建这一巨大的历史过程正在进行，需要我们有宏大的思想视野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要求更多优秀的青年学子来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也需要有合适的平台来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让他们得到锻炼。我期待，在现有的成绩上，我们能够把京津沪论坛办得更好，更为成熟。我期待，到下一届论坛举办时，我们能够走出京津沪的地域限制，真正走向全国，面向全国的国关学子。我还期待，我们的论坛能够逐渐发展成一个个持续、长期且稳定的自治组织，一个真正属于学生的学术俱乐部，这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我们就能集中更多力量办更多事情。对于华东师大《闻道》和南开大学《新视界》这两个编辑部来讲，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更多责任，让我们一起为国际关系研究生的自我成长努力吧！

广交国关友，传递学术情

刘 瑞*



2012年9月15日，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范孙楼举行。我有幸作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短短的一天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受颇多。几个月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太多的话想说。

* 刘瑞，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11级研究生，“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参会代表。

首先,本次论坛是一个国关人交友的平台。它将来自祖国大江南北 11 所兄弟院校的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了一起,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跟不同院校、不同年龄的国关人交流、交友的机会。与会代表们互通有无,毫无保留地向别的院校介绍着本校的国关状况,使我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了解到了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在茶歇时间,大家也会诙谐幽默地聊着共同关心的“国关圈”趣事以及国外的国关研究动态。此外,各位参会老师平易近人,在会上会下热情地跟我们沟通学习与生活,我受益匪浅。我想,本次论坛的所有参会者将会是我国关学习路上永远的朋友。

其次,本次论坛更是一个传递学术热情的平台。当兄弟院校的同学们将自己创办的国关专业期刊送到我手上时,我看到的是他们对国关的浓浓热情。他们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大多都倾注到了对学术的追求上,翻开期刊扉页,就能从细微之处深切体会到他们学术的严谨。当聆听着每位代表宣讲自己精心准备的论文时,我体会到的是他们对多元的国关理论的解读与运用,对国关研究新方法的尝试以及对国际社会中棘手问题的政策探索。当听到代表们直言不讳地点评别人的论文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的是国关学术研究的张力。不过,我相信没有一个代表会为得到批判而生气,因为大家都是带着谦虚的精神来接受批评的,也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代表们这种对学术的严谨精神、探索精神与批判精神给我这个学术研究的“菜鸟”提供了丰盛的学术盛宴,这是如此的弥足珍贵。我想,正因为有热情,我们才可以在国关研究的路上走的更远……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对此次论坛的精心筹备,感谢本次论坛的所有会务组人员对我们的热情款待,感谢每位点评嘉宾为我的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祝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期刊越办越好!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国关友人共同学习,传递学术热情。

南开大学第二届京津沪地区会议随感

王江波*

2012 年 9 月 15 日,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承办,国家开

* 王江波,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硕士生,“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参会代表。

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闻道》编辑部协办的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以“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与对策”为主题，我所提交的论文《认知视角下东北亚一体化的集体认同困境》有幸入选大会参会论文并做主题发言。

虽然现在距离会议召开已一月有余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话想与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需要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南开大学提供的平台和交流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大会发言人，而不是听众参与会议，是南开大学给予了我这次机会，所以诚挚感谢南开大学为此次论坛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其次，我需要不断加强专业学习。此次学术论坛参会范围之广，除了地域之外，更能体现的便是研究方向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理论探讨之外，参会论文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涉及内容



不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这一学科领域，还有很多跨学科的研究，并且很多研究生都已经做得相当优秀，我的论文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并不出彩，所以在以后的学习中还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专业学习。

此次研究生论坛作为国内国际关系领域首次以研究生为参会主体的论坛得到了诸多的关注。参会人员除了京津沪地区之外，还有吉林、辽宁、湖北等省份来的参会者，这既是同学们热情高的表现，同样反映出来的是类似的会议或论坛还很缺乏，虽然众多高校都举办研究生论坛，但诸多高校的国际问题研究生论坛仅仅局限于本校或兄弟院校，辐射范围之广度还远远不够，诚然，这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所幸的是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许多院校代表表示愿意举办第三届国际问题研究生论坛，这至少在暮霭茫茫中看到了那么点光亮，或许很小，但一旦燃烧也将是熊熊大火。

此次研究生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涉及的范围之广也许是国内众多专家学者论坛都难以比拟的，并且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出了目前研究生学习存在的一些“通病”。首先，论文大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论文过少，甚至能够熟练使用定量研究方

法的学生都很少，不可否认，《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一文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足以体现出了作者的功力，这既是广大研究生欠缺的，同样也是未来必须加强的方面。我们抛开定性和定量的争论不谈，单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定量分析将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种必备手段，但是我们目前掌握得还远远不够。其次，基础理论掌握的不够牢固。众多的学术论文都是运用或借鉴一个新的概念解释一个问题或现象，当然这也算得上一种学术创新，至少是方法上的创新，但是在对基本理论进行批驳的时候却凸显了作者对原有理论理解不到位甚至错位的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基础理论的掌握还亟需加强。最后，跨校交流还很欠缺。本次论坛的参会者来自五湖四海，这说明目前国际政治学科已经真正不再是一门“显学”，据有关统计目前国内开设国际关系学科的院校已经多达 53 家，这也体现了国际政治学科呈现蓬勃发展的状态，但是发展格局却有“山头”趋势，各个高校或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之间交流甚少，这固然与老师研究方向有关，但无疑对以后学术交流设置了重重障碍，所以高校之间的交流还需要进一步密切。

最后，还是想借此机会表达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九月在南开相遇的那些同道中人，俗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够在学生时代静下来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学术的人已然属于“边缘人”，然而能够有幸在这样的一个困惑期遇到这么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同仁”，就会觉得学术远远还没有到孤立无援的地步。或许多少年后我们会在另外的场合相遇，但谁也不会忘记研究生论坛带给我们的一切。最后，顺祝“国际关系学术论坛”能够越办越好！

感受论坛

陈一一*

这是一个真正属于研究生的论坛。金秋九月，怀揣着一颗求教之心进入了南开园，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论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虽然时间有限，但同为一份对专业的热

* 陈一一，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硕士生，“第二届京津沪地区国际关系学术论坛”参会代表。

忱和对知识的追寻，来自各高校的同学们汇聚在了一起。这一天短暂而紧凑，在与大家的热烈讨论中，我真实感受到了什么叫时光如梭。

知识的螺旋形上升在于讨论和交流，闭门造车往往会导致钻牛角尖的后果，这次论坛无疑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无论是从分组议题



的延伸讨论还是对文章本身构思的介绍，我都能深深体会到大家的用心和新意所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论坛起到了一个以文会友的效果，它吸引了对特定议题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从各地汇聚到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心与心的对话。

总的说来，此次论坛有两点新意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借鉴：

首先，议题的新。议题的新既可以体现为在成熟的议题领域中进行深挖，找出新意，也可以体现为进入一个新兴的议题领域展开讨论。这两种新，在汇报中都有所体现，比如从美国传统上的“恐伊症”情绪出发，看待美国霸权的演进过程。这种经典议题因为透过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形象的建构和态度的转变琢磨出美国对外政策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上的来回波动。此外，本次论坛也有多篇文章从当前国际局势的新热点——“阿拉伯之春”出发，选取其中典型案例予以新的学理性分析，比如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失败，或者使用政治合法性的相关理论对中东君主国与非君主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维稳情况做一对比……

其次，方法的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绝非易事，但却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这种努力在此次论坛的入选论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从定性的方法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很多论文已经有意识地通过一个去粗取精的案例筛选过程，而非拿来即用，这样便为文章的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对案例分析所匹配的方法的推敲也显得功夫不浅，可以说很多文章在使用案例时都做到了物尽其用。从定量方法的运用来看，本次论坛显然有了质的飞跃，从之前简单的数值计算到更为缜密和精确的建模计算，包括数据的运用，文章本身的质量和水准已经有了很大提升。由于我不擅长定量，因此对于专业性的点评会显得捉襟见肘，但我能明显

感觉到本次论坛中的定量研究文章已完全脱离了简单粗暴的框架，尽力做到了尽善尽美。

议题的新、方法的新，这是此次论坛中我感受最为深刻的两点，也是未来我应当努力的方向所在。我想，一次论坛并不能带来一个人学术修养上的巨大进步，但是却能给人以更大的启迪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提升个人学术修养的前提。常言道，聚时容易别时难，以此形容此次论坛实不为过。短短的一天，大家从五湖四海来聚，交流心得，学习新知，到论坛结束时，大家似已成为难分难舍的交心老友。从早到晚，夜幕虽已不知不觉降临，但一颗颗求知之心仍光亮如昼、熠熠如新。希望我们能把这份对知识的热忱从前辈身上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曾乔圆、郝丽君）



“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研讨会暨 第十三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2年10月11日至12日，由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主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外交部欧亚司齐大愚副司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与会者发言。包括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的政要及知名学者近8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卡特里娜·施莱格、我校副校长范军、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一同出席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2012年正值中亚国家相继独立20周年之际。20年间，中亚国家都进行了政治体制的转型，从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并不断调整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以此为背景，来自中亚、欧洲的专家同中方学者一同就中亚政治和安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Sultanov)发表了以“中亚国家政治和安全:历史进程与前景”为题的演讲，他指出，中亚地区日益猖獗的宗教极端主义、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不能不引起关注，而中亚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尚未结束，各国经济社会局势复杂是导

致上述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阿凡



特谢夫（Sergey AFONTSEV）从俄罗斯视角分析了中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会议还对中亚区域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可能出现的全球权力转移进行了展望。与会学者表示，可以预见的是，中亚区域的贫困、社会福利等问题将更加突出，中亚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将面临重大的深刻变化。

会议期间，由我院师生共同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2）》举行了发布会。与会学者强调了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亚地区综合合作的重要作用。

2012年10月12日至13日，在国际研讨会结束后，即举行了第十三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此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等机构联合主办。来自会议主办单位和北京、上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博士和硕士研究生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为“中国与中亚的安全合作与发展”、“中国与中亚的人文合作与发展”和“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三个议题。专家学者就当前中亚安全形势、毒品犯罪、中国与中亚的人文交流、中亚国家的法制发展、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中国新疆对中亚陆路口岸建设、俄白哈关税同盟对中哈经贸影响、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阐述各自研究成果并展开深入讨论。

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并在闭幕式致辞中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提出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思考，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

“印度洋的安全合作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11月22—23日，为期一天半的“印度洋的安全合作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我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中国未来研究会大

战略分会共同主办。

研讨会一共有三个主题，依次是“海盗问题与印度洋海洋安全”“国际和地区大国的印度洋战略”以及“国际合作与多边海洋安全机制建设”。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法兹尔·拉赫曼（Fazhar Rahman）教授、加拿大戴豪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常任研究员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s）、印度社科理事会东北中心副主任约舒亚·托马斯（C. Joshua Thomas）教授以及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扎尔·阿赫曼德（Azhar Ahmad）教授共四位国外学者，他们分别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另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利君教授、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朱翠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助理教授许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中心主任赵干城教授等6位国内专家也应邀出席，并做了主题报告。我院叶海林教授、潘兴明教授、王海燕副教授、姚远梅博士后等也出席了研讨会，潘兴明教授还做了题为“金砖国家与印度洋安全合作”的主旨发言。

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上，并做了以“中国周边安全与邻国的合作前景”为题的主旨演讲。

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刊物论坛

2012年11月25日上午,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A404会议室,我院院刊《闻道》编辑部发起并主办了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刊物论坛,论坛以“挑战、共存与发展:新媒体时代的学生刊物”为主题。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总支部书记、副院长何明老师参与了论坛。《闻道》主编吴途勇同学担任论坛主持人。



来自我校《大学》、《华实》、《大夏史学》、《知恒》等学生刊物的负责人和代表出席了论坛,论坛还邀请到北京《文化纵横》上海地区高校发行代表倪翔作为特邀嘉宾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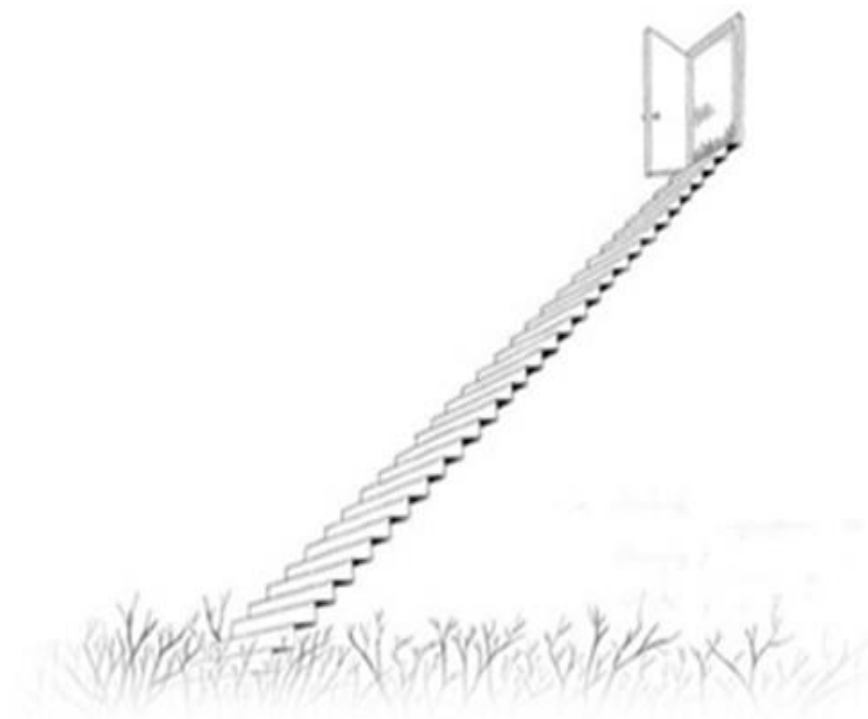
会议现场气氛活跃,与会代表和嘉宾纷纷发言,展开了精彩的互动式讨论,并达成了进一步合作的共识。在论坛报告阶段,各刊物负责人与代表分别从各自刊物的发展历程、定位、现状,刊物发行情况和编辑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发言。

在议题讨论阶段中,代表们就学生刊物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更具有吸引力、扩大影响,如何丰富稿源、提高稿件质量,如何解决发行中的编校设计问题,以及内部管理与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和讨论。

最后,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刊物论坛合作办法(草

案)》(以下简称《办法》),认为《办法》切实可行。该《办法》由《闻道》编辑部起草,旨在加强我校研究生刊物间的合作,推动研究生刊物发展,致力于将华东师大研究生刊物论坛建设成一个常规性交流平台和合作框架。《办法》主要有三大方面内容,即论坛会议制度、常设机构和具体合作机制,具体合作机制包括刊物交流交换、约稿及稿件稿源共享交流、工作互助机制、发展新成员、优质资源共享等机。参加论坛的各刊物就《办法》实施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建议会后就展开具体的合作。

(责任编辑:曾乔圆、杨晓娜)



简讯

1、2012年9月1日，国际著名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现任主席、悉尼大学的格雷厄姆·吉尔教授做客大夏讲坛，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俄罗斯的‘象征’政治”（The Politics of Symbols in Post-Soviet Russia）的精彩演讲。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报告会。吉尔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符号”就是那些能够以简单形式传达复杂理念的形象（Image），这些符号既包括特定环境中的语词、徽章，也包括艺术、建筑的形象乃至对于公共假期的设置和特定的社会仪式。

2、2012年9月2日下午，应俄罗斯研究中心邀请，IEECCS（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秘书长道亨巴赫、第一副主席松礼公孝分别就“欧俄关系：竞争、合作与冲突”“民族—区域联邦主义的兴衰：俄罗斯、中国、印度的比较”举行了系列讲座。会议由张昕博士主持并翻译，俄罗斯研究中心冯绍雷、贝文力、杨成等老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宁教授、复旦大学刘军梅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波副教授等校外专家学者以及我院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3、2012年9月2日，巴黎大学、巴黎高等工商学院韦遨宇教授访问我院，并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法国思想现状及中欧关系”的精彩演讲。韦教授在谈到法国思想现状时，强调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在介绍中欧关系时，他以战略伙伴关系为例，分析了中欧双方对于“战略”的不同理解，基于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强调了沟通与思想交流的重要性。韦教授还对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4、2012年9月5日，波兰国际问题研究院 szczudlik-Tatar 教授访问我院，与我院欧洲研究中心的师生进行了座谈会。座谈由潘兴明教授主持。Szczudlik-Tatar 教授先就2004—2012年中波关系发展历程作了一个简要的报告，指出中国与波兰和中东欧国家间的关系总体上日趋紧密。同时，她也指出，中国与波兰之间还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和政治文化交流。之后，与会者就中国如何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5、2012年9月14日，由执行主席 Liviu Muresan 先生率领的罗马尼

亚欧洲风险基金会代表团访问我院并同我院师生进行了座谈。座谈由潘兴明教授主持，王海燕、王铁军、臧术美、陆建松等老师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参加。与会者就中欧关系、中罗关系、当代国际形势与格局、中亚形势与能源、欧洲一体化现状与未来、国际太空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6、2012年9月19日，国家汉办俄罗斯教育官员访华团访问了我院。我院总书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老师向客人们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俄罗斯同行们表达了加强各种形式合作的意愿，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院的资料室、俄罗斯研究中心和白俄斯研究中心。

7、2012年9月2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发起并作为牵头单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为主要参与单位的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京成立。“周边中心”属于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体，将联合国内、国际知名智库，在外交部、中联部等有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对与中国周边的和平发展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提升高等院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周边研究创新能力，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核心利益和整体安全服务。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8、2012年10月17日，我院联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举办华东师范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之国关院专场报告会。冯绍雷院长出席，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老师应邀与会。我院潘兴明、汪诗明、贝文力、包承柯、杨成、王海燕、余南平老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赵银亮副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副研究员分别作了报告。

9、2012年10月22日，中日问题专家、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教授到访我院，并以“从钓鱼岛之争看中日关系的新变化”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就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作了深入分析。24日，朱教授还作了一场主题为“日本如何看中共十八大及今后中国的外交走向”的报告。

10、2012年10月29日，杨成绪大使在A404报告厅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近期国际热点问题与中国外交”学术讲座，我院副书记兼副院长何明老师主持了本次讲座。杨大使回顾了过去十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就美国“重返亚太”和西亚北非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外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责任编辑：曾乔圆、翁伏虎)

 院外播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G20 中的亚太领导力：变动中的联盟和潜在集团”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9 月 14 日—15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韩国发展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共同举办“G20 中的亚太领导力：变动中的联盟和潜在集团”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到来自包括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等 9 家国内单位的官员及学者，以及来自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 13 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智库及大学的近 30 位官员及学者。与会人员就中美关系波动与 G20 的发展趋势、中日韩三边合作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七国集团和金砖五国在 G20 中的作用、G20 与其他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摘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国际安全与世界秩序再思考：中国的角色”研讨会召开

2012 年 10 月 13—14 日，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举办“国际安全与世界秩序再思考：中国的角色”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国防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四十余所高校和出版社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具体划分为“中国的国际定位”、“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周边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发展、国内舆论与对外政策”和“中国外交：方向与挑战”五个主题进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在地区与世界的角色定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及未来中国外交应该是更加积极进取还是继续韬光养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中欧关系与欧债危机新动向”研讨会举行

2012 年 10 月 20 日，由清华—格罗宁根中欧关系研究合作项目举办的

“中欧关系与欧债危机新动向”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研讨会邀请了欧盟驻华使团首席政治参赞 Frederic Maduraud 博士以及来自中欧的知名学者专家做主题发言。会议围绕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的挑战而展开，与会者提出未来的能源短缺困境是中欧共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时，资源问题将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不稳定因素，欧洲目前的债务危机使很多社会问题、安全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等暴露出来，中欧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会议还讨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最新状况。与会学者们认为中国与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双方需要以实用且理性的视角维护并发展中欧关系。

（摘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网页）

国际关系学院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举行

2012 年 11 月 3 日，由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论坛主题为“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东亚安全形势与中日关系的新挑战”、“中国的应对之策”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摘自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三论坛 “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举行

2012 年 11 月 3—5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了第三分论坛“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的讨论。来自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位汉学专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参加了此次分论坛。

分论坛围绕“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汉学研究”、“文化·文明与软实力”和“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中国的视角”、“文化差异与东亚地区合作”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责任编辑：曾乔圆、翁伏虎）